觀察

• [illegible] •　三十六年十一月八日　• [illegible] •

第三卷　第十一期

專論

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　周炳琳等四十八人

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　董時進

人身自由的保障問題　韓德培

討論

小康經濟　費孝通

歐洲通信

西歐紀行(一)英國　錢能欣

觀察通信

邏輯上的「排中律」(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淮上血淚(淮南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浙大學生被捕慘死案(杭州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文藝

論雅俗共賞　朱自清

觀察文摘

論存儲反應　吳世昌

讀者投書

一封信　鄉間苦

晉南共產黨的殘暴

白報紙的浪費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鐵崖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濬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乾　顧頡剛

讀者投書

本刊暫時不收讀者捐款

編者先生：今日讀到大作許蒲立特報告一文，句句都是我們有眞心的中國人所要說的話。站在中國人民立場，謹向先生致敬。不過我們一羣青年讀者對先生的恐怖環境，時刻掛念，千萬希望先生為國珍重。

關於貴刊的經濟困難以及白報紙問題，我有兩個建議：第一、因為貴刊絕無政治背景，純係一個民營刊物，一切困難，應由讀者共同來分担，所以我主張由讀者自由捐贈，以加強貴刊的經濟力量；不過無論捐贈多少，決不可干涉貴刊的言論。第二、可否在香港出航空版，就在香港寄發讀者，或可減少紙老虎的威脅。

我是小職員，謹由銀行匯贈十萬元，以盡微意。

陸樹人　十月廿八日　香港

編者按：陸樹人先生的意思我們非常感激，但是我們暫時不欲接受讀者的捐款。這有兩個理由。第一、本刊經濟情形尚未達到要向讀者呼籲的階段，我們願意先由我們自己來努力解決。第二、這一年來，我們已深受讀者的愛護，假如沒有讀者的支持，本刊不會發展到像現在這種地步，因之我們不欲另外再加重讀者的責任。萬一將來我們必須向讀者呼籲捐助時，到那時再請讀者支助。

對于陸先生的十萬元捐助，我們決定辭謝。但因港滬匯兌不便，所以他這十萬元，我們即以之轉作他的訂戶名下，作為他的訂費。（編者）

一封信

編者先生：恕我寫信不署名。我的名字當然并不怕先生知道。只因如寫上名字，縱然於我無損，也許對先生有所不利，至少恐使此信失去意義。我們雖然從未相識，也許見過面而未交談，但是我的名字，先生當然是知道的。我的名字本來未嘗不可見于「觀察」封面下那一堆撰稿人名字之中。所以未見，顯然只因過去尚未相知，與有所避忌之故。

其實我給先生寫信，現在已非第一次。猶記前年尊編「客觀」在重慶出版時，讀後因感到非常喜歡，并因向感中國社會過于冷淡，彼此漠不相關，對於作惡者既熟視無睹，對於作點什麼好事者，也全不理會，因此卽寫一短信對先生表示欽佩。不知怎的，當時信寫好封好之後，竟擱置抽屜之中，未卽發出。後來南北奔走，時候興會一過，此信遂未發寄；至今恐仍存在重慶存物之中，將來也許仍有發見之一日。寫信而不發，雖仍由于中國社會的冷漠習慣，但今日卻自覺曾有此信，尚不失為知人。

以後我也漸漸曉得先生乃是我熟人的熟人了。「觀察」在滬創刊後，我以奔走平京，遂也時看時不看。（以前只買有戴文獒先生文章的，後來連有他的文章的也不買了。對於議論政治的文字，一向不甚感覺興趣。）最近乃聽人稱道先生之敢言，及「觀察通信」欄最為特色，為人所愛讀。偶然也買了兩期看看。今日買到三卷九期，讀到大作，實在感到無上的忻悅，敬佩與同情。看到有的地方，直感到已在肚內落淚。因此擺脫一切，立寫此信，竟作瑣瑣之談！

也許今日中國最要緊的就是眞正非國非共的人如何團結起來，站立起來。也許這種人始終不會有隙縫團結起來，站立起來；那便只有坐看現在有力的雙方相欢的結果。但也許，無論如何，這種相欢的結果，不會令非國非共的人滿意。因此，我縱不問政治，對於國家前途却不能不感到隱憂，而無可如何。當然，只這一點，也許就可為國共雙方所同不容。

國方情形已知大作所說。至於共方，在鄉間所作所為，未能親眼看過，也總覺未能充分了解，因此也不能卽信其必能成功。也許根據馬克思主義，以及因為打仗的緣故，他們不得不如此。但總覺也許不必要花費這樣大的犧牲。如果只為成功，也許或有更好的辦法，或更適合中國國情的辦法可用。

我始終空想，在中國要和平發展并非不可能。但照目前相欢的情形，和平發展或已竟不可能！則我之所想或終落于空想而已。雖不甘心，又能如何！

在一九三六以前，世界許多人都感到要有一個一九三六到來，結果一九三六到底是到來過了。現在又多年，又有許多人預言世界要有一個第三次大戰。假使世界上人仍像一九三七或一九三九以前樣子，能知者并不能有所作為，或不能有及時的作為，則此次豫言誠恐仍要必中。

就在世界今日，也未嘗不是好壞兩方面同在發展着。可是每天陳于一般人眼前的（報紙），總是壞的記載為多，就令不說只有這多，這也似乎未嘗不增加了一般人心的不安，助長了戰禍！

縱然也許可說，很少人有意地製造大戰，多數人所為只由于成見與恐懼。但照馬克思主義的客觀看法，却也未嘗不可說，許多人所作所為是正在製造世界大戰或美蘇之戰。卽如所謂蒲立特（從不知有這麼一個人！）的報告，其客觀的結果，恐亦只有如此。

半年來總覺着，現在一件要緊的事是集合世界一切有心有腦的人，以愛因斯坦與羅素為領導，會議一次，切實分門別類地對於許多現實問題，如資源分配、互相了解、在不同主義不同制度下相安共存等等，都得一個可行的答案。可是在目前情況下，這又如何可能？

遠的不論，只論中國，戰禍總以越早結束越好。這就不能不特別寄望于一向未染顏色而不甚被猜疑之人。

久未着筆，遂爾言長。但望「觀察」可以長存。切希珍重，并候譔祺，不盡。

應不具　十月卅日夜　北平

晉南共黨的殘暴

編者先生：貴刊言論，素為一般讀者愛讀。間或有一兩篇共軍佔領區的通訊，然不若載評國民黨的評論多。現在投給一點關於晉南人民怎樣活的消息。自從四月共軍由晉東南大軍直撲黑河邊沿，前兩個月沒有人不說共軍軍紀好。但軍事過去，政治來了，農會成立，老百姓就受不了了。算老賬，清血債，一幕一幕的演出來。一縣進一縣，一村進一村，天天打死人。人死的慘狀，難以筆述。舉一兩個例子：夏縣參議員衞秀生等四人，在民衆會上，先割去一耳，次挖去兩眼，鼻子嘴巴以至於肚子腸子都順序用刀殺死。臨晉馬村王姓老財主，一天打一頓，打下鼓不准打上部，把他的家產分光，十數天才把他打死。其他被打死的人很多。以上是處置三資的辦法。（有資格、有資望、有資產）。普通中農以下的無知和貧民，雖然當時很滿意的分了富人財產，但是今日派担架，明日選壯丁，有時一個村中可抽去四五十人，都送到豫西，編入正規軍，參加爭城略地的戰爭。現在晉南的老百姓無論貧富，編的編，死的死，逃的逃，赤色恐怖已經造成。我懂得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但是我也知道他是革命，爭取政權，想把統治權玩弄到手。（下接十八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國內訂閱
三個月十二期　平寄：五萬元　掛號：六萬元　航平：六萬元　航掛：七萬元
六個月廿四期　平寄：十萬元　掛號：十二萬元　航平：十二萬元　航掛：十四萬元
如郵資漲價，請讀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霞公府甲一號

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第十一期
三十六年十一月八日

本期作者

周炳琳等四十八人：北大清華燕京三校教授
董時進：中國農業協會理事長
韓德培：武漢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錢能欣：
朱自清：清華大學教授

我們對于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

最近政府突然宣佈民主同盟爲非法團體，負責當局甚至謂將適用「處置後方共黨臨時辦法」加以處理。在民主時代的今天，尤其在政府宣稱積極行憲的前夕，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此事業已引起社會注意，我們站在自由國民的立場誠有不能已於言者。

政府此舉旨在消滅民盟，且不論其直接效果如何，實對民主憲政的前途留下極惡劣的影響。蓋容忍反對的意見，尊重異己的政黨，實爲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今政府壓迫民盟之舉，實難免於「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之詬病。充此而言，勢必至於惟依附政府之政黨始能活動，惟順從當局之人士始得自由。一不合作，遂謂之「叛」，稍有批評，遽謂之「亂」，又且從而「戡」之。試問人民的權利何在？人民的自由何在？我們即使不爲民盟不平，也不能不爲國家前途，爲人民安全，感到深切的憂慮。政府如簡捷了當明白宣告不復實行民主憲政，我們即無一句話可說。政府既尚宣稱維護民權保障自由，則我們還願意鄭重進其忠言：對於一個持異見的在野政團如民盟者橫施壓迫，強加摧殘，這是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舉動。

從法理的觀點言，我們更願指出幾點。團體固爲各個人所組成，但個人行爲却不一定即團體意志的表現。政府所列舉民盟某些份子的若干行爲，即使確有其事，也不當影響其所屬團體的合法地位。例如抗戰期內各黨份子或不免有附敵者，我們不應就認該黨爲賣國的黨。此其一。團體而被解散，其組成份子之個人絕不應因團體而株連。民盟盟員個人倘無違法行爲，絕不應因其身爲民盟盟員而有罪。例如目前南京民盟人士之被監視是不當的，所傳强迫民盟份子依限登記是無理的。此其二。人民如有犯法之罪嫌，拘捕必須依法，審訊必須依法。至於政治罪嫌，尤應許其有公開申辯之機會。此乃法治國家之起碼的條件，無待申論。這是說，近來各地層出不窮的「失蹤」事件也都是破壞法治損害國家的現象。此其三。

據上所言，爲民主憲政前途計，爲人民基本權利保障計，我們願以自由國民的立場，向政府嚴正陳言：（一）對於宣佈民主同盟爲非法團體一事，應當重作決定；（二）倘民盟竟被解散，其善後各事之處理必須照公平合理之原則，不得稍有蹂躪人權之舉；（三）恢宏氣度，責已容人，纔是賢明執政的作風，政府於此尚須多加留意。義之所在，不容緘然，願與全國人士共勉之。

周炳琳　金岳霖　趙紫宸　張頤　朱光潛　朱自清　陳達　趙承信
張奚若　鄭華熾　鄭天挺　俞平伯　許德珩　吳之椿　邱椿　王鐵崖
樓邦彥　戴世光　孫雲鑄　鄧以蟄　楊人楩　袁翰青　雷潔瓊　錢偉長
余冠英　胡世華　樊弘　容肇祖　嚴景耀　翁獨健　馮至　游國恩
費青　任華　黃眉　鄭昕　李廣田　孟慶基　張龍翔　陳振漢
孫楷第　許維遹　沈元　曹本熹　屠守鍔　段學復　羅士葦　王遜明

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

董時進

民主同盟卒被政府宣佈爲非法團體了，這事體原不出人意料，由近月來政府與民盟間的各種事態的發展，許多人已料到早晚將有此一着。政府發言人與民盟發言人的舌戰筆戰已交綏多次，甲方硬說是事實的，乙方硬說不是事實；甲方硬說是證據確鑿，乙方硬說是誣害揑造。大家只聽到他們吵吵鬧鬧了一陣，忽然幹掉了一個，對於詳情眞相却是莫名其妙。對於是非曲直，尤難認識清楚。不過我感覺政府這一舉動，固然是給民盟一個打擊，但同時也給了它一種很大的幫助，因爲中外報紙的大標題的宣傳以及可能引起的同情，將不是民盟自己以任何其他方法所能贏得的。至對於政府本身，則此一措施反而可能是損失多於利益。

政府宣佈民盟爲非法，主要的理由是說它「勾結共黨參加叛亂」。要說民盟裏面絕對沒有親共或共黨份子，我不敢担保（但我亦不敢說一定有）。但是民盟的主腦人物如張瀾，梁漱溟，黃炎培，沈鈞儒等幾位老頭子，都是潔身自愛的老讀書人，他們的人格的正直清廉，都是可以相信，而且值得欽佩的。他們不滿意政府是實情，但如果說他們是共黨，或與共黨勾結，陰謀響應，恐怕不易令人相信。民盟這個團體是反對政府的，不能否認，它因爲反對政府而將同樣反對政府的共產黨引爲同志，（就反對政府一事而言，不必是信仰共產主義），並曾經與之取得聯絡（就總動員以前說），大致也是事實。民盟分子是否有人參加共黨活動，外人自然無從知道，但是我還沒有發現任何眞實的證據或理由，能够使我相信民盟這個團體，或民盟的主腦人物確實曾經參加共黨活動。政府因爲有若干民盟分子參加共黨活動（假定屬實），即將民盟視爲非法，這理由殊不能使大家心服。譬如國民黨也未始沒有參加共產黨的，過去甚至有人參加僞政府，但豈能因此即可以認國民黨爲非法團體？固然國民黨可以將此種黨員開除，而民盟則沒有這樣辦，但須知在國民黨係爲直接對付共敵人，故不能不有此措施，而民盟則係處於第三者地位，其情形自然不同。

我稍知道一點民盟的內容情形，覺得政府把民盟的力量和危險性都估計得太大了。許多人並不是盟員，而政府硬說他們是盟員，許多事未必是民盟所策勵的，而政府硬說是他們所策動。政府的情報並不見得那麼十分精確，但政府却根據那些情報去判斷民盟，爲民盟宣傳。固然不免冤枉民盟，而同時也太給民盟幫忙了。民盟得到了一些不當的虛名，也受了一些不當的實禍。所有那些防範和取締民盟的舉動，太都是由於太重視民盟而產生的，實際上是毋需的。

爲什麼說政府此一措施對於政府自己的影響可能是害多於利？因爲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大多恨它腐敗貪污，而認爲尚可取的，則是比較上還能給人民一點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團體也還可以存在。人民對於共產黨最害怕的是它的專制，太不給人民自由，黨派根本不能存在。政府假使是聰明的，應該利用自已的長處去對付共黨的短處，那便是利用上述的普遍的心理，使人民感覺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對黨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動。世人相信美國比蘇聯民主，最好的證明是美國容許華萊士一類的人在國內國外大事咆哮，而蘇聯則無論如何拿不出這樣一個證據來。這樣的事實勝過一切雄辯。政府對付共產黨的最優良的武器不是飛機大炮，乃是全國的人心；贏得人心的辦法，一是革除貪污腐敗，一是以事實行動證明政府是民主的，容忍的，而與共產黨作風迥然不同的。如果政府令人民感覺它對於幾個手無寸鐵的老頭子所領導的一個黨派尙不能容忍，則他們必致認爲這政府更無所取了。這當然是政府的一種損失。

中國的局面弄得這樣僵，前途這樣黯淡，一個大原因是政府及共黨雙方都完全迷信武力，太不重視民心。實則歷來戰事的勝負，概是取決於民心之向背，而不在乎武力之強弱。如共人民對於統治者都存了一個是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之心，則政府未有不倒的。如果人民對於革命者如大旱之望雲霓，則革命未有不成功的。目前的局勢是兩方都不要人民，都在爲淵驅魚，所以人民也徬徨不知去向，而戰爭的勝負，因此也難於判明。假定有一方能眞心誠意的愛人民，爲國家，澈底表示民主大度的精神，並能博得人民的歡心與仰望，則那一方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政府爲什麼不採取這樣的策略？

我不相信高壓可以平亂。政府是革命出身的，應記得以前革命黨是如何受壓迫，如何流血，然而革命黨越殺越多，勢力越壓越強。政府應該引其前身的政府爲殷鑑，不宜蹈其覆轍。解散一個團體，只能解散其形式，不能解散其精神，甚或反而更堅強其精神。強迫民盟分子登記，會使得一些縱有脫離民盟意

思的人都不肯去登記，因為誰願受人指罵為懦夫，為賓黨求活？高壓可以使地上的活動變為地下的活動，可以使政治方式的鬥爭，變成革命流血的鬥爭，這正是大家所不願有的。

人民對於政府今後如何處置民盟分子，當然會密切注意，究竟他們的罪名是實是虛，人民也能辨認幾分。政府萬不可以使人民發生「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感覺，尤其不可使人民認為政府是要一步一步的消滅異己和一切不合作的黨派。只要不是武裝集團，無論是民盟也罷，其他任何黨派也罷，對於犯法的個人，儘可依法審判，對於其他的分子和團體的本身，應該一視同仁的盡政府保護之責，保障憲法上所賦予的一切權利。憲法上既然說人民有言論自由，則政府便應嚴格尊重人民的這項自由，即使是反對政府和反對憲法的言論也應容許其自由（只要沒有反對的非法行動）。

人身自由的保障問題

韓德培

談到自由問題，就會令人想起西洋十七十八世紀以來個人主義的思想。因為在政法思想上，擁護個人自由的主張，是從近代個人主義的思想中孕育而出的。這種主張的最輝煌的結晶，便是法國的人權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及其憲法。自十九世紀末葉以還，由於社會主義思想的逐漸抬頭，個人主義的思想已受到很嚴重的打擊，於是人們對於所謂個人自由，也便不像往日那樣崇拜若狂，以為神聖不可侵犯了。今天我們雖無須完全恪守傳統的擁護個人自由的主張，但是鑒於當前我國政治社會的陰霾重重，人民權利的橫受摧殘，我們對於凡與人民的身體安全及正當生活有密切關係的種種自由，究不容不予以重視。而在這種種自由中，首先值得予以注意的便是所謂人身自由或說身體自由。

人身自由可說是人民所應享受的「基本權利」中最基本的一種權利。人身自由如無保障，則其他種種自由如居住，遷徙、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工作等等自由，便都無由行使，無從享受。所以人身自由也可說是上述種種自由中最可寶貴最應予以保障的一種自由。近年國人「保障人權」的呼籲，往往便是因要求保障人身自由而發，或甚至是專指保障人身自由而言。

人身自由之應予保障，近年在一般國民方面，固早已成為一個共同迫切的要求，就在政府方面，也曾三令五申地予以明白確定的承認。可是不幸在事實上，人身自由之被非法侵害，仍是層見迭出，屢見不鮮；從種種跡象上看，使人深感這種自由至今仍未能獲得充分有效的保障。只要翻開報紙看，就可隨時找到不少的例證。至於未經報紙刊載的非法侵害人身自由的事件，想來還更不知有多少。當今朝野人士，常在討論「法治」「憲政」問題。但是假如連這種人身自由——最基本也可說是最起碼的一種自由，都還無保障可言，則所謂「法治」「憲政」云云，恐怕都將不免成為空談或廢話。

人身自由之有無保障，首先須視法律上之規定為何如。人身自由之被非法侵害，最顯明而常見的，便是非法的逮捕和拘禁。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八條第一項曾規定：「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本年元旦公佈十二月廿五日即將實行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也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人民之逮捕拘禁，本非絕對予以禁止，也沒有理由應該絕對予以禁止。但如要逮捕拘禁，就非「依法律」去做不可；否則便是非法的逮捕拘禁，是非法侵害人身自由。所謂「依法律」云者，分析起來，係含有以下三點的意義：第一須有法定的原因做根據；第二須由法定的機關去執行；第三須依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去執行。關於這三點，在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上，都有很清楚而細密的規定。其中第二和第三兩點，與人身自由的關係尤為密切，現在就讓我引用一些法律條文的規定，略予說明，藉使與法律條文不常接觸的人知道一個大概。

關於法定的機關一點，照我國刑訴法的規定，無論逮捕或拘禁，通常都必須由法院（指廣義的法院而言，包括檢察官在內）簽發拘票或押票，然後才可執行。詳細一點說，就逮捕言：雖然現行犯人人得予以逮捕（刑訴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但一般犯罪嫌疑人，如要予以逮捕（即刑訴法上之所謂拘提），在偵查中必須由檢察官簽發拘票，在審判中必須由審判長或受命推事簽發拘票，然後如交由司法警察（指警察、憲兵等，見刑訴法第二百十條第一項）或司法警察官（指縣長、市長、警察廳長、憲兵隊長官等，見刑訴法第二百零八條第

一項，第二百零九條第一項）去執行（刑訴法第七十七條第二項，第七十八條第一項）。就拘禁言，情形亦復相似，即對刑事被告經訊問後如認有拘禁（即刑訴法上之所謂羈押）之必要時，也必須在偵查中由檢察官，在審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推事簽發押票，然後始交由司法警察去執行（刑訴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可見就逮捕拘禁而言，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僅有奉命執行或協助執行之權，而並無獨自決定執行之權。前面所舉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八條第一項，雖係將司法機關與警察機關相提並列 但二者之權限實非完全相同。我們不妨說只有法院或司法機關始有逮捕拘禁的權限。

其次關於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就逮捕言：(一)對於現行犯，雖人人可予逮捕，但無偵查犯罪權限之人（即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以外之人），逮捕現行犯時，於逮捕後，應即送交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而接受或逮捕現行犯的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於接受或逮捕後，也應即解送檢察官（刑訴法第九十二條第一第二兩項）。(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拘提刑事被告，應用拘票；拘票之內，應記載案由、拘提之理由、應解送之處所等事項；執行拘提時，應以拘票示被告，並應注意被告之身體及名譽（刑訴法第七十七條，第七十九條，第八十九條）。(三)拘提之後，應即將被告解送指定之處所。被告因拘提或逮捕到場者，應即時訊問，至遲不得過廿四小時。除認其有應羈押之情形外，於訊問畢後，應即釋放（刑訴法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三條）。就拘禁言：(一)羈押刑事被告應用押票；押票之內應記載案由、羈押之理由、應羈押之處所等事項；執行羈押時，也應以押票示被告，並應注意被告之身體及名譽（刑訴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第二項）。(二)管束羈押之被告，應以維持羈押之目的及押所之秩序所必要者為限；被告得自備飲食及日用必需物品，並得與外人接見，通信、受授書籍及其他的物件，但押所得監視或檢閱之；如有足致其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憑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禁止或扣押之。被告非有暴行或逃亡自殺之虞者，不得束縛其身體（刑訴法第一百零五條）。(三)羈押於其原因消滅時，應即撤銷，將被告釋放（刑訴法第一百零七條）。

以上所述逮捕拘禁之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大都是為着防止司法機關於逮捕拘禁時侵害人民的人身自由而設，可說是為着司法階段下的人身自由所設的一些保障。在司法階段下的人身自由，在事實上固不因有上述的種種規定便已獲得絕對的保障，此點暫且不論。但近年人民的人身自由之被非法侵害，最使人感覺不滿者，往往並非由於司法機關所為之逮捕拘禁，未盡依上述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而是由於司法機關以外的一些無逮捕拘禁的權限的機關，任意非法地逮捕人民，拘禁人民。關於此點，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中華民國憲法以及提審法中，也都設有種種保障的規定。這些規定，在用語上雖彼此尚略有出入，但其要點可綜合述之如下：

（一）告知原因——逮捕拘禁之機關，應將拘捕拘禁之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最近親屬，至遲不得逾廿四小時；本人或其親屬亦得請求為前述之告知（提審法第二條，憲法第八條第二項）。

（二）移送法院——執行逮捕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廿四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移送法院審問（約法第八條第二項，憲法第八條第二項）。

（三）聲請提審——本人或他人得以書面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或其所隸屬之高等法院聲請提審。法院對提審之聲請認為有理由者，應於廿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發提審票。逮捕拘禁之機關，接到提審票後，應於廿四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解送法院。法院訊問被逮捕拘禁人後，認為不應逮捕拘禁者，應即釋放。認為有犯罪嫌疑者，應移付檢察官偵查（約法第八條第二項，憲法第八條第二項，提審法第一條第一項，第三條，第六條第一項，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條）。

（四）懲罰及賠償——逮捕拘禁機關之公務人員，不於二十四小時內，將上述（一）項所述逮捕拘禁之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或其親屬，或於接到提審票後，不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解送法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勞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提審法第十條），又依中華民國憲法之規定。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之公務員，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憲法第廿四條）。

這些規定，雖然不能謂盡善盡美，但如能順利嚴格地施行起來，其對人身自由所給予之保障，總不能不算差強人意了。誠然在特殊情形之下，例如政府依法施行戒嚴後，在戒嚴時期的戒嚴地域內，軍事機關的權限可以侵入司法機關的權限範圍之內。但是依戒嚴法的規定，也應視情形而分別論之。遇有戰爭時，戒嚴之宣告，如係經戒嚴法所定之立法程序，即經立法院之議決者（戒嚴法第一條），在戒嚴時期的所謂「接戰地域」內，即「作戰時攻守之地域」內，地方司法事務因須移歸該地最高司令長官掌管（戒嚴法第八條），但在所謂「警戒地域」內，即「戰爭時受戰事影響應警戒之地域」內，則司法官僅於處理「有關軍事之事務」時，始應受該地最高司令官之指揮（戒嚴法第七條）。至於因國內遇有非常事變，政府不經立法院之議決而對於某一地域施行戒嚴時

，該地域內司法機關之職權，却不得因之而受侵害。惟關於刑事案件，如認爲與軍事有關應施行偵查者，該地軍事機關始得會同司法機關辦理之；但偵査後仍應交由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戒嚴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所以我們決不能說一旦宣告戒嚴，在戒嚴時期的戒嚴地域內，司法機關的職權，即全部當然由軍事機關來行使。即以最近行政院於九月二日通過並經國府於九月十六日公佈施行的「後方共產黨處置辦法」而論，雖規定共產黨員或爲共產黨工作人員潛伏後方，如不爲登記之申請，即應由「當地治安機關一律予以逮捕」，但仍規定「於法定時間內，移送有審判權機關」，依法懲處。此所謂「法定時間」，當不外上述之「二十四小時內」。可見就是對於共產黨員，法律上也未允許治安機關可作無限期的拘禁。由此可知人身自由在法律上的保障，大體上總可算相當周密了。

不幸的是，這種法律上的保障，就近年發生的許多事件看來，在實施時却困難重重，不一而足。本來照法律上的規定，對於非法之逮捕拘禁，本人或他人原可實行正當防衞，加以拒絕（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刑法第廿三條，中華民國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但是那些非法執行逮捕拘禁的人，若非「彪形大漢」，便係「有槍之人」；在這種場合之下，試問如何能希望無拳無勇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實行防衞，加以拒絕？而另一個最大的困難，便是近年那些非法逮捕拘禁人民的事件，常常是以所謂「失蹤」的神祕姿態而出現，當事人一經「失蹤」，便往往杳如黃鶴，不知去向。究竟是那一個機關將那「失蹤」之人逮捕拘禁，根本就無從知道。縱然知道是那一個機關所爲，但它也可以矢口否認，諉稱不知。報上載過上海某法院，有一次曾以提審票向某軍事機關提審一被捕之人，該機關竟將提審票原璧奉還，「頂」回去了。下文如何，也就不得而知了。像這樣逮捕拘禁之機關究竟是那一個機關，都無從而知，如何還談得上以上所說的那些告知原因、移送法院、聲請提審以及懲罰賠償等等呢？直截了當地說，今天人身自由的保障問題，並非一個單純的法律問題，因爲就法律的規定言，法律對於保障人身自由，可謂已盡其能事。今天的眞正問題，是如何能使法律上那些保障人身自由的規定，被認眞遵守，嚴格施行；是如何能使那些白紙上的黑字，在實際上發生充分保障人身自由的效果。簡單說一句，就是如何能使法律上的保障，變成事實上的保障。

這個問題，涉及政治上教育上以及社會風氣上的種種問題，非此地所能詳細討論。不過有一點可以提出的，就是人身自由（以及其他的種種自由）如要獲得充分有效的保障，除靠有法律上的規定而外，最低限度總須政府官吏能了解自己負有一個守法的責任。這個起碼的了解，是非有不可的。本來談到所謂「法治」問題，最須着眼者就是政府官吏守法與否的問題，而並非人民守法與否的問題。在任何一個政治社會裏面，當然需要有大多數的人民願意守法（無論是自願的或是被迫的），然後才談得上法治。但如大多數的人民對於統治者所公佈的法律，雖偶有違法行爲，但並非不願遵守，而於違法時一經政府「執法以繩」，便俯首聽命，翕然就範，這種情形對於法治之實行，實在並無妨礙。不但無妨，還可說這正是實行法治之所企求的一大目的。假如要人民個個都不違法，都不做違法行爲，這只能求諸理想的大同世界，而不能求諸法治的政治社會。法治這個名詞，就隱隱含有人民可能違法的一個前提在內；唯其如此，統治者才有利用法律的強制力予以制裁以實行其統治的必要。所以法治云云，決非含有希望所有的人民個個都不違法之意，而是至少從統治者的眼光來看，應指統治者於人民違法時便藉法律的強制力予以制裁以實行其統治而言。但如僅僅這樣課人民以守法之責任，而不課統治者以守法之責任，這種法治，從人民的眼光來看，仍是不平等的，非民主的法治。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本是掌握武力或權力（指軍隊、警察、監獄等等所代表者而言）的唯一合法者。但正如孟德斯鳩所云：「凡是有權力的人便易於濫用其權力」。（tout homme qui a du pouvoir est porte a en abuser）因此，要講求法治，就更須講求對統治者的權力如何用法律加以限制，使其僅能在法律的範圍內行使其權力。近代西洋人所講的法治，當初無不從限制皇室或行政機關的權力一點着眼立論，也就是這個道理。上面所說的課統治者以守法之責任，也並非希望他們絕對不做違法行爲，而是要他們於願意守法之外，如有違法行爲，一定也讓自己接受法律的嚴格制裁而不由自己任意把法律操在一邊。倘若我們的政府官吏能有這樣的了解，了解他們並非超乎法律之上，而是和人民一樣，也都負有一個守法的責任，那麽我們談人身自由的保障或「法治」「憲政」等問題，庶幾可不致完全落空，完全無望。

（十月廿二日）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小康經濟

——敬答吳景超先生對「人性和機器」的批評

費孝通

前二年的冬天，在昆明青雲街的小茶館裏和袁方先生閒談，他說要到成都去開手工業討論會，我們接着說了很多關於中國手工業的話。後來張子毅，張肇基兩位先生又參加了我們的談話，說完了派着我把這番話寫下來，由袁先生帶到成都去，算是我們共同的意見。在那裏的討論會中宣讀。後來這篇文章印成了時代評論的小冊，我加上了一個題目：「人性和機器」。抗戰勝利了，這小冊又在生活書店印了一次，所以頗有流傳。

事隔兩年，我回到北平，整理舊書時，吳景超先生在旁邊，因為我們在這小冊裏提到吳先生工業化的主張，所以把它借給了吳先生。不久吳先生在經濟評論一卷二十期上發表了一篇「中國手工業的前途」，同時口頭約我作文答覆。因為疏懶，一直拖着沒有寫。在昆明時，湯德明先生也曾寫過一篇很長的批評在報紙上發表過，後來聽說在「理論與現實」上又重刊了一次，我也沒有答，總好像欠了一筆債似的。不久以前社會學會開年會，同人們要吳先生和我口頭上討論一次，承蒙大家注意這問題，很熱烈的有一番辯論。後來我又在「手工藝」刊物上讀到了一篇為我抱不平的文章。愈積我想說的話也愈多，雖則關於這問題的意見還是沒有出我所寫的那本小冊和在這小冊以前為張子毅先生的「易村手工業」（商務）的序，（後來重印在我的「內地農村」裏）。在這裏再度把這些泛泛無甚高見的論調提出來說說，也許並不是多餘的，因為在這裏的確有幾個有關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問題，值得多加討論，雖則我很明白現在談建設似乎還是不切實際的紙上文章，但是遲早我們還得碰着這些問題的。——是為引。

兩種看法的相同和相異處

對於中國今後建設工業可以，同時亦應該，採取的方針，尤其有關鄉村工業應該在全部計劃中占什麼地位和應該是什麼性質等問題上，吳景超先生的看法和我們以往已經發表的看法，有相當的出入，因之曾引起了吳先生對於「人性和機器」一書的批評。但是看法雖則有出入，在很多基本出發點上，我覺得我們是相同的。為避免我們的討論流入枝節問題上去，不妨把我們基本相同點先擇要一提：

一、我們都不滿意於當前的經濟現狀，而且都認為改善的方針必須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為目的。

二、「如想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決不可忽略生產方法的改良」。

三、當我們眼望着將來時，都願意「使現在的小村莊都可以轉變而為一種工農混合的新社區」。

吳先生的看法和我們有出入的地方可歸成下列幾點：

一、我們不願意在生產方法改良過程中忽略了鄉村手工業的地位，而吳先生則認為「手工業一定是逐漸衰微，而終於消滅」。所以「當機立斷」「手工業在中國是沒有前途的」。

二、我們認為「生產方法」不但包括「技術」而且包括社會方式。我們亦認為「利用機器時可以有不同的社會方式，並不是一定要走西洋（英美）所走過的舊路一成不變的」，因為在西洋的機器文明中「人和機器之間並沒有完善的調適」。所以「我們的問題是如何在現代工業中恢復人和機器以及在利用機器時人和人的正確關係」？吳先生雖則沒有對西洋（英美）資本主義的社會方式說過什麼話，但是對於「近代文明」則認為是有趣而且享受豐富。「近代文明」和「機器工業」都是都市產生的。而都市是自由的園地，「你可以對於自己的生活，照着自己的愛好去安排，而不受固身的物質環境及風俗傳統所束縛」。吳先生所理想的就是現代美國的都市生活。他的希望是怎樣使中國也變成像現在的美國一般。

三、在我們考慮怎樣建立人和機器的健全關係中，我們在傳統手工業中看到若干值得保留和發揮的要素，這些要素在我們看來是可以和利用機器並行不悖。這要素就是「手藝精神」。我們認為在鄉村工業的型式中機器生產和手藝精神是配合得攏的。吳先生也主張分散工業。可是他這樣主張是出於不得的已，怕原子彈的破壞，所以工業不得不逃避下鄉。他接下去覺得這不得已的辦法也有好處，因為可以使農村都市化。這樣，「近代文明也連帶下鄉，也帶給在鄉村中的人民，一種更有趣的生活，更豐富的享受」。

同異之點交代清楚，我可以接下去一說為什麼我們並不能完全同意於吳先生的看法了。

問題是怎樣在當前復興工業

我們在「人性和機器」裏第二節開頭就說：「我們並不願意抽象的來比較手工業和機器工業的長短」。所謂「抽象」就是脫離了具體的社會背境的意思。我在社會學年會討論時會說：「如果原子能征服了月球，吳先生和我一同去設計一個建設方案，我相信我們不會有什麽不同的意見的；每個人所想象的天堂離不了樹上長滿葡萄，河裏流着牛乳那一套。可是我們現在要應付的是吳先生描寫在「刼後災黎」一書裏的中國」。

當吳先生眼睛看到這具體的中國，心裏想着美國的「近代文明」時，他說了：「我們可以斷言，在最近兩三代，我們即使朝野一心，努力於工業化：決不能達到美國的生活水準」。又說：「在兩三代之內，想趕上英美等國家，大約是不可能的」。（見「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觀察三卷三期）。這等於說，要在兩三代裏中國工業做到美國的機器化大約是不可能的了。吳先生一方面說手工業終必消滅，另一方面又說機器化不可能，在兩三代內中國豈不是會成工業眞空了麽？吳先生可以不討論這兩三代內的事，輕輕的用「逐漸衰微」四字一筆勾銷，而我們所關心的却不是兩三代之後的事。我們早說：「若是我們再等五十年才發生現在的問題，也許又容易得到解答了。……可是，我們是活在現在，不在五十年前，不在五十年後」。

我們並不否認手工業「逐漸衰微」的事實，我們說過：「手工業的崩潰是中國百年來經濟的致命傷……手工業崩潰不要緊，我們並沒有理由去姑息它，可是新工業興起是否能解決因手工業崩潰而引起大量人民的失業和貧困的現象」？因爲「手工業」一直到現在是我們最大多數人民所倚以爲生的職業」。

關於最後的一點，吳先生要我們放心：「機器工業的出現，并不產生失業問題」。他用西洋的歷史作保證，更從經濟理論上說明機器工業是造業的，不是消滅職業的。

吳先生給我們信證是不够的，因爲我們是在中國，是兩三代之內的中國。這個中國一方面大量銷售，或承受救濟，舶來機器製造品，而自己沒有大規模的機器工業的國家；另一方面所有那一點集中在少數都市裏的機器工業所得到的收入並不一定投資在中國的。關於第二點吳先生也許可以說過這是特殊情形：資金外流雖則中國幾十年常見之事，而且於今爲甚，但是今後可以改變。但是吳先生却自己承認興立大規模的機器工業很難不藉外資。既藉外資，就不能控制由於外資所得利益不外流。這種機器工業在所在國營業力量是否可以趕得上被機器所代替的失業速度？這是問題的第一層。如果再加上第一方面所引起的失業，我相信即使樂觀的看法也不易被把國界除外的理論保證所說服的。何況吳先生所用的理論是根據「競爭的經濟社會」，這個根據在現在實際世界上還有多少存在，更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當然，這個問題的討論，現在來講，未免太早，吳先生所給我們的保證是以中國能有大規模的機器工業爲前提的，當在兩三代之後才能實現。我們所發愁的是過去幾十年來和現在還在繼續發生的「手工業的崩潰」所引起的失業現象。這現象我們雖則拿不出統計來，但是吳先生大概也不會否認是事實罷。即使我們找不到像西洋一般有「失業工人」，但是我們確知在農村中有着更多的閒手：停了布機的媳婦人，靠着扁担沒有人雇的街頭挑夫，——都應當算作「失業」的，甚至「失業」項下還得包括找不到工作去當兵的人。

吳先生退了一步說：「假如機器工業眞能造成大規模的失業，那麽無論把他設立在什麽地方，失業是終不可免的」。這話在理論上說又是顚撲不破的。可是吳先生並沒有考慮到實有的社會圖局。讓我先舉一個例子：停了布機的媳婦們，依吳先生的說法本來可以進城去「轉業」的，城裏更自由，更有趣。但是在非到不得已時，很少鄉下媳婦們會聽吳先生的理論指導。這倒並不是他們不懂這理論，不會打算，而是她們並不祇是單純的「經濟人」。她們到城裏去了，留下孩子在家，不放心；在田裏做工的丈夫也得有人燒飯給他吃。這一套「媳婦」的責任並不能使她追求「自由」。如果，她可以不必離家，依舊能找得到事做時，她是可以「轉業」的，那就是把小型工廠開到鄉下去可以減少失業的一個例子。

我們的問題是比較現實而具體的，中國鄉村裏以往有分散而普遍的手工業，後來因爲競爭不過都市裏，尤其是西洋都市裏，的機器工業，以致這些手工業無法或不易維持——這是事實。這事實引起了現在在鄉村裏住的人生產的機會減少了（或說失業），因之收入也減少了（或說貧困）。我們面臨這現狀怎麽辦？怎樣去增加他們生產機會？怎樣去提高他們的收入？怎樣去增進他們的生活程度？

吳先生可以說這和他所提理論毫不衝突，因爲目前我們看到的失業現象是出於生產縮緊，如果我們有了大規模的機器工業，失業現象就沒有了。我們不應因爲機器工業發生之後在中國發生失業現象，而恨起機器工業來，其實祇有機器工業才能解決這大家不滿意的情形。造成失業的是「工業衰落」，應付的對策是「擴大工業」。

這正是我們在「人性和機器」，以及「易村手工業序」裏一再申說的要點：「讓我們加重的說，中國幾千年來並不是沒有工業的國家」。「整個的大趨勢是中國經濟的澈底農業化」。「農業中國等於是個饑餓中國。把工業集中到了國外，或外資經濟下的「孤島」上，是剝奪我們廣大民衆的生活憑藉」。——我們的問題是怎樣重建中國人民賴以爲生的工業。

關於鄉村工業的概念

這樣說來，我們和吳先生的看法應當相同了，却又不然。不同的原因是吳先生看得遠，我們看得近。吳先生心腸硬，我們心腸軟；吳先生要根本解決，我們却在想過渡辦法；吳先生一說起「改良生產方式」立刻想「以機械來代替古老的筋肉」，我們却想慢慢以機械代替人工。我們會說：

「一方面我們得顧全傳統工業的分散性質，一方面我們又得顧全它技術的落後。工業不能很快和全部的抽出於農村，同時又要使分散在農村裏的工業，技術上逐漸現代化，脫離純粹的手工和人力基礎。這是我們戰後初期的經濟建設中一個極費考慮的問題」。

我們提出這極費考慮的問題是因爲要遷就現實。吳先生因之說我們對於手工業「留戀」，對於機器工業「厭惡」。我記得好像湯德明先生對我們也有類似的批評，甚至稱我們這種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加上略帶輕蔑性的「費孝通的王國」的按語。在我們自己看來倒是我們太缺乏了「空想」的能力，也太缺乏了對任何社會方式及技術本身的留戀和厭惡之感。我們是極平庸的想最可能實行的有效方式中去提高最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程度罷了。

如果吳先生能指示我們比我們這種平庸的過渡辦法更有效的捷徑，我們絕不「留戀」於我們所想到的逐漸把機器吸收到鄉村裏去的辦法。我們毫無成見，但是我們也得說，我們並不能滿足於兩三代之後才兌現的諾言，也不能滿足歷史邏輯自會決定我們前途的定命論。

其實吳先生也同意，至少在過渡時期，我們所建議的逐漸把機器吸收到鄉村裏去的辦法。但是却在名稱上却不願用這討厭的「手工業」三字去形容這部分機器化了的鄉村工業。他會說我們顯然把農村工業和農村手工業兩個概念，混爲一談。他下着明白的定義說：「如用的是有生能力」就是手工業，如用的是無生能力就是機器工業。」他又說：「農村的工業可以是手工業，也可以是機器工業」。其實吳先生所同意我們的那種鄉村工業，既不是手工業也不是機器工業，而是兩者的混合形式，同時用有生能力和無生能力的。稱它鄉村手工業如嫌待虧了它，稱它鄉村機器工業也未免過分抬舉了它，所以我們常用兩者的通稱「鄉村工業」。鄉村工業並非不是手工業即是機器工業，常常可以既是手工業又是機器工業。如果我們想爲自己辯護時，正可以說，這並非概念上的混淆，而是事實上的複雜。

更有進者，吳先生祇從「動力」一項要素來辨別手工業和機器工業，可是這兩種型式的工業的區別並不祇限於「動力」要素。就字論字，手工和機器都是指製造時所用的設備或工具。（雙手可說是生物機體上天生的工具），推動的是有生能力，推動機器的是爲力能力。動力的性質其實並不包括這兩個字的本身。顯然的，手搖機也可說是「機器」，而動力是有生能力。

我這樣說並非主張「望文生義」，或是有意吹毛求疵，而是想說明這兩種型式的工業如果要加以嚴密的定義時，似乎不應祇限於動力一個要素。依普遍的文化論說，這是兩種制度，包括物質基礎，社會組織形態。惟有從這三方面同時去說明方能算有了完整的概念。（下期續完）

利用機器的社會方式

這種看法使我們注意到「手工業」所包括的我們所謂「手藝精神」，因而我們在討論「中國手工業前途」時提出了人性和機器的基本問題來了。

吳先生並沒有考慮到我們對於現代資本主義中人和機器及由利用機器而發生人和人的關係的分析。他把我們對於現代文明中的一部分社會制度的批評看成我們對於整個現代文明的批評，因而把「甚至于與他最親密的妻子，都是別人替他安排」的傳統文化來和「可以選擇自己的妻子」的現代文明相比較，結論自然「在都市中住慣的人都不願再回到鄉村中去，連費先生等都包括在內。」——這種批評我們認爲不公允的。

我們的看法在「人性和機器」中曾簡單的說明。吳先生既引用了我們一段結論，我們似乎不能不把發生這段結論的意見，不避冗長之嫌，引用在這裏：

經濟活動是人的活動，是人的利用自然資源來滿足生活的活動；一個正常的經濟必然是要以人爲主。人有他的意識，人有他的目的。可是機器的利用發生一種反客爲主的一種現象。從一個在機器上做工的人說，他的活動是在服侍機器。現代機器的發達，尤其在大規模的工業中，勞工對於機器活動的目的已經不能明白，不必過問，甚至連機器活動的原理也可以不問，他祇要按着所規定的動作中去和機器配合就夠了，這是機器文明中的一個極重要的發明：發明了生產活動，人和機器都在內，可以合理的配合起來，在最有效的方式中進行，人的活動可以規律化到和機器

一般。這種把人的活動隸屬於機器活動之下，是一個現代的觀念，在這觀念中創造了空前的效率。可是人畢竟是人，在一個人發現自身的活動沒有了目的，成了另一個東西的奴隸時，心理必然會有衷心的反感。哈佛大學工業研究所費了十多年的時間發現了現代的工業裏的工人生理上易於疲乏和社會上易於發生不安的基本原因，就在這種有意或無意的反感。

一個人的健全生活必須有一個生活上各部門的配合。這配合締一個綜合各種活動的目的。在現代機器生產中，因為機器的龐大發展，自身有了一個生產的目的，根據這生產目的的配合了機器和人的活動。為了求合理化，參加這種活動的人把他們一部分的活動，在被雇的一段時間中，在整個生活中割出來隸屬於這個超出於他所關心及所了解的生產目的之下。當然，每個參加生產活動的勞工都有一個參加的目的，如養家，如得到較高生活等，但是這些個人的目的和生產活動的目的確不相符合的。從生產活動本身講，缺乏了一個綜合的目的，從每個人講，生產活動成了達到另一目的的手段，對於手段本身缺乏了熱忱和興趣。於是為了生產目的去配各機器和人的活動起見，不能不用消極的動機，定下各種規則，甚至以工資的升降，和失業的威脅，加諸於勞工身上，使他們不能不出售和交付他們一部分的生活，從事於不感興趣的任務之上。現代工業為了生產過程中活動的配合犧牲了參加這活動中每個人生活上的配合。這些人失去了生活的完整，不但影響到生產活動的效率，而且因而發生個人人格的失調，和由這些人所組成的社會波動和不安。人和機器之間並沒有完善的調適。

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的學者們業已指出這個制度中 的基本精神並不是從人本觀念上發生的。造成資本主義的固然出於生產力的膨脹，使人能在消費之餘累積財富為再生產之用。可是若是生產的目的終究是在人的享受，則資本主義終必受限制。資本主義的能無限發展是因為在生產過程中生產本是目的；生產，再生產，使經濟活動力脫離個人享受而入於財富的累積本身，使利益成為決定生產的樞紐，推其極，使生產工具控制了人。

另外我在「初訪美國」的第六章「機器和倦乏」和為史國衡「昆廠勞工」所寫的後記中，對這層意見都有發揮。在這裏我願意再說一遍，在歐美工業先進國家所採取利用機器生產的那種資本主義社會方式祇是許多可能方式中的一種。資本主義社會方式從歷史上說是和機器工業同時發生，而且會有密切關係。沒有機器發生，生產能力不能膨脹，資本不易累積，不易再生產，生產工具不易脫離者所有；沒有資本主義，機器工業不易因資本不斷用手生產而獲得迅速發展。所以從歷史上說兩者是相配合的。但是歷史上的相配合，並不是說兩者不可分。社會主義的出現就是利用機器來生產的另一種社會方式。因之我們對於在資本主義中機器所引起人格及社會的失調的批評並不是對機器本身的批評。我們並不是認為機器脫離了相配的社會方式有任何作用的。因之有若干朋友認為我們「反對機器生產」，那是出於誤解我們的意見。

還有一點和吳先生及若干朋友不相同的是在：我們認為任何一個國家所能採取的社會制度必然受該國文化和社會處境所影響，所以我們認為我們的課題並不是「英美式呢還是蘇聯式呢？」而是以增加人民生活程度為目的。熟察我們自己的歷史背境及社會情況，設計一個能利用機器生產的中國式的社會方式。

我們在設計時，歐美各種國家的經驗是我們參考材料。我們得取長去短的得到最適合於我們自己的方式。我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方式中機器和人的關係的批評是從這個觀點上發生的。至於我們的批評得對不對那是應當提出來討論的，但是如果有因為我們對歐美經濟方式不滿意而就認為我們「留戀於過去，不願求進步，」那是我們不願意接受的。

平庸的理想

吳先生同意我們鄉村工業變質，逐漸應用機器的主張。可是同一主張背後的理由卻不不同的。他說：「如果我們能將工業的位置，作一有計劃的分配，則在原子時代，設立工業于鄉村，是有國防的理由的。：；原子彈對于都市破壞之大，使我們深切的認識，把工業集中于少數都市，從國防的觀點看去，實在是很不安全的。」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機器工業到了農村之後，可以使農村變質，使農村成為一個更適宜于人類居住的社區。」

我們的理由是從民生的觀點上着眼的。我們認為我國人多地少的小農經濟中農業並不能單獨養活這擠在土地上龐大的人口。我們並沒有效的辦法可以減少人口到「漢唐時代」，從四萬萬五千萬的數目降到三千萬。吳先生說：「使其退回到三千萬人，不是短時期內所能做到的事。」這話我們還覺得太輕了一些，除非利用原子彈，這是件近於不可能的事。即使我們能積極在可能範圍內節制人口，能求其不漲得太快，已不是一件短時期內所能做到的事。所以一個現實的經濟計畫不能不以「人多地少」為不易變的的前提。

在傳統經濟中我們是在鄉村工業來補農業的不足的。這個農工互相補助的方式是小農經濟的安全瓣。鄉村工業的衰落，不但是中國工業的縮緊，而且是中國目前土地問題日見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主張恢復傳統的方式，因為我們實在想不出其他能適應於這在短時期內無法改變的小農經濟。

我用「小康經濟」來作本文的題目，在這裏可以提出一個註釋了。吳先生所理想的是個像美國一樣富的中國。理想固然不妨陳義稍高，但是以這理想標準來看中國現實，不免會發生「失敗主義」！我覺得吳先生那篇「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不免給人這種印象。在那篇十分重要的文章裏，吳先生很明白告訴了我們，至少依我們讀來，這個理想是不可能在兩三代之內達到的。所以我們不妨「當機立斷」拋開這個「美夢」，回到我們東方標準來，追求一個「小康」的水準。

小康水準可以用孟子的話來說明：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

說來似乎標準低極了，但是人口這樣多，資源這樣小的國家，如果學美國一般的浪費揮霍，必然為發生爭奪民食民衣的「豪門巨閥。」把標準定得低到了「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的境界，要實現在「刼後災黎」的中國，已够我們效力的了。

標準和理想放低了些，我們的計畫也可以現實了些。我們所主張就地推廣小型工業到鄉村裏去所可以實現在民生上的決不是美國式的生活，而是東方的小康生活。

卽是想做到這小康生活，我們覺得還是不容易，因為我們原有的鄉村工業太落後，不能和現代工業競爭，所以我們不能讓現有鄉村工業自己去掙扎，而必須有計畫的把現代技術，組織、精神輸入鄉村。接着我們會說：

至於如何可以在小工業輸入現代技術，那是要很多有技術知識的人耐心去研究的。我們農村經濟的安定就得靠這一種人才，這種人得像傳敎士一般肯耐苦肯不求名利的把新技術傳入農村，向農村輸血。

手藝精神的再生

最後，我們還得提到另一個理由就是在這種小康經濟中我們可能發揮一種健全的人和機器，及因利用機器所發生人和人的關係。這是我們從手工業中所見到的手藝精神。我們會解釋這精神說：

手工業中人和工具的關係是；人是主，工具是客。而且在主客之間充滿着夥伴精神。再說得深刻一些，一個手藝工匠十分愛護他的工具，因為他明瞭祇有從他的工具裏可以充分發揮他的手藝，表現他的人格。這是人對於物最正確的態度。人和物是相成的，人在物裏完成他的生活。

在手工業裏不但人和工具有着夥伴精神，而且對於生產過程具有一種表演的態度，在生產過程中，一個工匠在完成他認為一件有意義的工作。也因此，一個工匠對於他的出品有期待，有滿足。他可以在出品上刻着他自己的名字。出品的毀譽是自己的榮辱。這和一個現代工業裏的工人的心理很有差別。

在人和人的關係裏，現代西洋的機器工業因為集中在都市裏，所以把人口從他們原有的社會團體中折散了出來，重新依了機器及廠房的區位需要加以聚攏在一起。人自然不能沒有社會生活的，在這些人中產生了組合，可是這些組合卻缺乏歷史性的契洽，祇是為了片面的依着某一種興趣而聚攏來的。因之表現出高度的不穩定。吳先生認為這是「自由」。「自由是都市的特色。你可以在都市中，選擇自己的職業，選擇自己的妻子，選擇自己的鄰居，選擇自己的朋友。你可以對于自己的生活，照着自己的愛好去安排，而不受固有的物質環境及風俗傳統所束縛。」

在現代歐美都市中的人是否都有吳先生所說的「自由」還是一個值得考究的問題。吳先生把風俗傳統視作束縛也是籠統的說法。我們認為自由和束縛本身並沒有意義。文化本身也可以說是束縛；並不能因為語言束縛了我們表達情意的方式，而要求放棄語言；相反的，我們在語言束縛中才有傳達的自由。自由在完成我們生活目的時才有它的意義。吳先生所讚美的「都市自由」有些正是 Le Play 和 Durkheim 等社會學家認為是社會解組的現象，因為這些所謂「自由」就是「離婚」、「犯罪」、「貧窮」、「失業」、「自殺」的原因。

我們這樣說並不是想為鄉村裏所有任何風俗和傳統的內容辯護；這些是隨着處境而變遷的，但是我們卻願意說沒有風俗沒有傳統的社會，如果有這種社會的話，也不是我們的理想社會。

我們知道究竟那一種生活才能令人滿意的問題是無法討論的。在這裏我們祇想說明，在「人性和機器」中我們主張把經濟活動成為完整社區生活的力量，而不使它成為相反的破壞力量，是從一種社會價值的認定上發生的。這個認定似乎是我們和吳先生的看法最基本的相異之點；說到這一點，我們想我們所要說明和吳先生的看法為什麼不完全相同的話也可以結束了。

三六年十月二九日於清華園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訂閱

西歐紀行：(一)英國

錢能欣

凡是戰後到過英國和歐洲大陸的人，幾乎有着一個同樣的印象；即是整個歐洲在饑饉恐慌之下。法義等國，戰時發了橫財的人，大黑市商，以及戰後復活的資本家，居然還能消遙饑餓線外，享受着像戰前那樣奢侈荒唐的生活，而惟獨海峽一水之隔的英倫，政府對於經濟的管制，愈來愈嚴密，人民不分貧富也就愈來愈吃苦。在戰時可得到的肉類牛奶黃油，現在減少了大部分，衣服的分配，縮到一人一年祇能添製一套，假使要買幾雙襪子幾塊手巾，那麼衣服就不能添製。最嚴重的還是煤的缺乏。去年冬天的煤荒，弄得工黨政府手足無措；也虧得是工黨，否則政府必會垮台。那次煤荒影響很大，非但使每個英國人更深一層了解已湧到了目前的經濟危機，而且還提醒了對大英帝國還抱着奢望的人們。

英國人民對於政府的措置不滿，表示反對者有之，但對於政府的法令和設施，還是服從和合作。一個工人或一個家婦儘管在公共場所指摘政府的臨渴掘井，準備不當，但回到了家裏，不在規定的時間內，決不肯插上電爐或燃起煤氣，這是英國人的修養。戰爭雖然把他們打得精疲力盡，但他們的自尊心沒有損害。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忍耐和未來的創造之中，他們有意識與無意識地覺得應該做歐洲人的模範，這樣才能在金元政策橫行之下保全它的自主和及於大陸的影響。

大英帝國在國際間的地位，英國人民都很明白。英俄兩強的利害衝突，在近百年史中到處可以見到，而德意志兩度的起伏，把英蘇關係口是心非地造成了更尖銳化的局面。戰後的情勢使英國人民覺得這樣的局面不必也不能再維持下去，不但是因爲自己國力的虧弱，而且因爲有着更強大的新大陸的朋友願意來接受一切任務。工黨政府即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的。

英國人對於新大陸的朋友是君子之交，早在一九四二年秋季第一批美國飛行員在倫敦附近的飛機場降落，接收了一部分皇家空軍遠征大陸的任務後，他們却感受到心理上的威脅，而尤其對於美國雜誌以「從前有一只獅子」那樣的故事來嘲笑他們，感覺到份外的憤恨。

大體說來，英國的政治和社會，正在經過着一種溫和的不流血的革命，這種革命是發之於素有政治修養的人民心中，爲了國家的生存和復興應付目前環境所必須的改革。原來，英國是目前惟一具備着實施社會主義條件的國家，人民的政治修養和自覺，工業的基礎，而促使工黨上台的近因是戰後國家經濟的危機和美蘇兩強對立的國際環境。

目前的工黨政府是從資本主義走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在國內爲了應付保守黨的攻擊，不能徹底的實行社會政策，在國外雖已撤退了印度，但爲了帝國的安全，還是支持法蘭西和荷蘭用兵越南與印度尼西亞；在外交上大致和美國站在一邊，但無時不想在美蘇之間另找一條出路。這樣的政府所遭遇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在國內保守黨攻擊其把大英帝國開倒車；工黨的激烈派則責備其行事妥協不徹底；在國外，和蘇聯合作一再無頭緒，而美國政府未嘗予與充分的信心。

可是英國究竟應該走向何處去呢？是否再讓邱吉爾上台，大刀闊斧地在歐洲幹一翻，在美蘇之間加上一把油？大多數英國人都不作此想。兩次大戰結果，眼看人家富強起來，而英國所遭受的在政治上殖民地日益離心，在經濟上則是接連的不景氣。依靠自治領也不是容易的事，即以目前想成立不列顛國協關稅同盟一點來說，自治領都不很熱心。事實上較富有的加拿大和澳洲與新大陸的關係比與倫敦更密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前途尚不可知，惟一可以打入預算的是南非聯邦。但斯末資老頭子一旦去世，那樣忠順於母國的情形是否會仍舊維持下去，也是問題。

我在英倫旅行了兩星期，和約克州的礦工曼哲斯特的工人談過話，和牛津與劍橋的學者對飲過酒，也聽過許多倫敦家婦的牢騷和憤言，但無論是不滿意現狀或責難政府，大家都覺得唯有自救才有希望渡過目前的難關。所以工黨政府能一再的施實緊縮法令。爲了要挽救英鎊，停止了一切的匯兌，自十月一日起連最小限度的國外的旅行費用也取消了。離開英國須受嚴密檢查，如爲英國人，即使是手指上的結婚金戒也要扣留。在積極方面，拚命的增加生產出口，換取外匯。現在什麼都受政府管制，除了煤什麼都以出口爲第一。工黨政府最近成立的經濟部目的便是在執行這個任務。（下接二十頁）

觀察通信版

邏輯上的「排中律」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民盟之被內政部確定爲非法團體，下令解散並接收其房產，雖然華盛頓人士感覺這消息來得奇突，感到驚異，而南京方面人士是毫不奇怪的。自戡亂總動員令下後，邏輯上的「排中律」在南京的政治上運用得更爲周密。「順」「逆」之辨，早已在官方的印刷品上大量渲染。青年黨是本來比國民黨更右的集團，其最初之加入民盟，乃是在不得意的情形下不得已而爲之。識相的民社黨，至此索性把和平的僞裝，脫得一乾二淨。各方人士，早已爲民盟危懼。先是軍報和黨報對民盟公開討伐，繼則在中央文化運動會的主持之下，南京文化界人士通電要求解散民盟。南京的文化界人士一發動要求解散民盟後，於是各地文化界人士的響應便紛至沓來。熟悉中國政情的人，看了這種情形，便知道政府不久便將「俯順輿情」，有所表示了。張君勱在「再生」上的聲明，攻擊民盟去年曾受周恩來之影響而不提出國大名單，南京各報曾用中央社報道此文的專電，刊在顯著地位，大大地增加了聲討民盟的聲勢。住在梅園新邨的羅隆基感覺不妙，曾在被解散前一星期拜訪南京憲兵司令部張鎮司令，據張鎮對羅說，政府並無意思限制民盟人士的自由活動。

王世杰部長到美國去是出席聯合國大會。但他把一大部份時間化在華盛頓，與杜魯門馬歇爾及其他國務院人士有多次的長談。正在他返抵國門的一天，十月廿七日，中美救濟協定簽了字，七千萬美金的物資可以使極度拮据的中國經濟情形喘一口氣。王外長返京後即飛牯嶺，向蔣主席述職，旋即公布杜魯門已批准對華十三億美元的貸款，這當然是王世杰在美談判的結果，似乎與聯合國否決權的三擒三縱，也不無關係。但也就在十月廿七日這一天，內政部宣布民盟爲非法團體，而蔣主席也恰恰在這天飛到廬山去避壽了，京中盛傳，廿七、廿八兩天的晚上，南京與牯嶺間的往返電報徹夜不絕。第二天，南京各報以半版以上的篇幅，刊載中央社發表的「民盟參加共匪叛亂經過」，其冗長可與蒲立特的「訪華報告」相媲美。大家這纔恍然大悟，政府過去對於民盟之曲予優容，仍是受經濟之累，一旦經濟有了辦法，對於這個不承認憲法而堅持政協路綫的政團，是不惜採取斷然手段的。

民盟的解散是在王部長認爲美國對華政策較兩個月前已有改善之後。所謂兩個月前，是指魏德邁使團來華調查事實，回去報告以後。這個報告到目前尚未公布。但在宣布民盟爲非法團體以後，據合衆社廿八日華盛頓電，美國務員高級官吏却「表示不樂」。因爲到現在爲止，『馬歇爾所主張的美國政策，堅強希望南京政府羅致自由分子，並授以實權。而民主同盟即爲美國官員所認爲自由主義的團體。』因此華盛頓方面推測，中國此舉將使美國之對華政策橫生枝節。甚至於『美國當初對於此種先期信號，即表示不滿。此種態度已在南京方面向中國政府當局表示。』政府一向認爲民盟是一個反美團體，而被反的美政府對於反者民盟之解散，反而表示不滿，是頗有點令人不解的。南京方面有人則認爲政府宣布解散民盟，未免太早一點，如果等到十三億五千的美金放進荷包之後再發動，華盛頓方面決不會「橫生枝節」了。如果因此而影響到貸款，未免太不合算。政學系的外交部費了很大的勁，向杜魯門和馬歇爾保證中國政府怎樣民主，怎樣要實行公平的選擧，而CC系的內政部却宣布民盟是非法團體，無怪美官方認爲解散民盟之用意，『即使其無法參加十一月間之國大選擧』。實則美國人對中國事無論如何是外行。他們竟認爲這個選擧是和美國政黨一樣公平，而民盟也會承認而參加這個選擧的！

說到這個選擧，本來是國民黨的一種妙用。去年的國大代表是遴選的，今年要由民選了，其中也包括政黨提名。所謂政黨，其實只有民、青兩黨，其主張即使放在顯微鏡下，也很難看出與國民黨有何不同。在中國，遴選雖然不太民主，但其名單也許反而可以像樣一點。如果自由選擧，譬如在四川，跑哥們的團體就准可操勝算，誰也無法否認其合法。此外則幾乎全是CC的天下，敢與抗衡的只有軍人。「抗戰時期我們流血送命，現在你們當代表作官」，是最令人不服氣的。現在已在加緊組織，而且要請陳立夫到勵志社去講話。「秀才碰着兵，有理說不淸」，只好推托傷風感冒，不敢領敎。「政黨提名」和「保證民、青兩黨國大代表及立委監委名額」，是去年該兩黨參加國大的「君子協定」。如果只有提名而不予保證，也只有全部落選，獲得一場慘敗，根本推翻了目前的空架子，比不提名還要慘。但是今日的情形，已大非昔比了。「共」已成「匪」，「盟」亦變「奸」，民青兩黨的恃以門兩大，倚輕重者，已完全失去。去年今日，後車數十乘，傳食於國共之間的優游形勢，已不可再得。除了俯首聽命的份兒，還有什麼作爲？即欲分一杯羹，也不是當初訂「君子協定」那樣容易了。「保證名額」之說，先就發生了動搖。到近來，索性連「政黨提名」的「選擧法」，也被人提出反對，要取銷這一條，按普通三千人和五百人連署的辦法提名。這也許只是一種攻勢，未必眞會這樣辦情，但是一片花飛減却春，今日國民黨中若干分子覺得民、青兩黨可資利用的青春時期已經過去，今後面目之日見其老醜，即令分一杯羹，也會覺得是浪費，却大可由這次競選名單問題中看出來。

現在離開選擧不到一個月了。如果民盟解散以後，繼以民、青兩黨之無法競選或不許提名，那是對於政府民主的遠景太不漂亮，可能會影響到今後的貸款的。所以相當限度的名額，這兩黨是可以分到的。並且，從大處看，只要民青兩黨唯命是聽，又何樂而不使其作爲民主政治的裝飾？但這年頭兒從大處看的並不多，『我們幹了二十年的忠實黨員，爲什麼要把代表立委讓與別人？』這是最流行的抱怨。「競選壓倒的勝利，並不妨害其爲結束訓政，實行憲政，退居普通政黨的民主政治。」這是另一種想法。民青兩黨在這大選前的苦悶，正是失去青春的悲哀。

在這場選擧以後，人們可以想見一幅美麗的遠景：還政於民了，民主憲政了，國民黨選擧勝利了，但已是普通政黨，而非訓政黨了。剿匪軍事、將爲全民所擁護，而照目前頒布的出版法規，將使全國輿論比在抗戰時更加統一。這幅遠景有點像抗戰以前，其不同之點一爲「訓政」，一爲「憲政」；也有點像抗戰以後，其不同之點一爲「抗戰必勝」，一爲「剿匪必勝」。

淮上血淚

梁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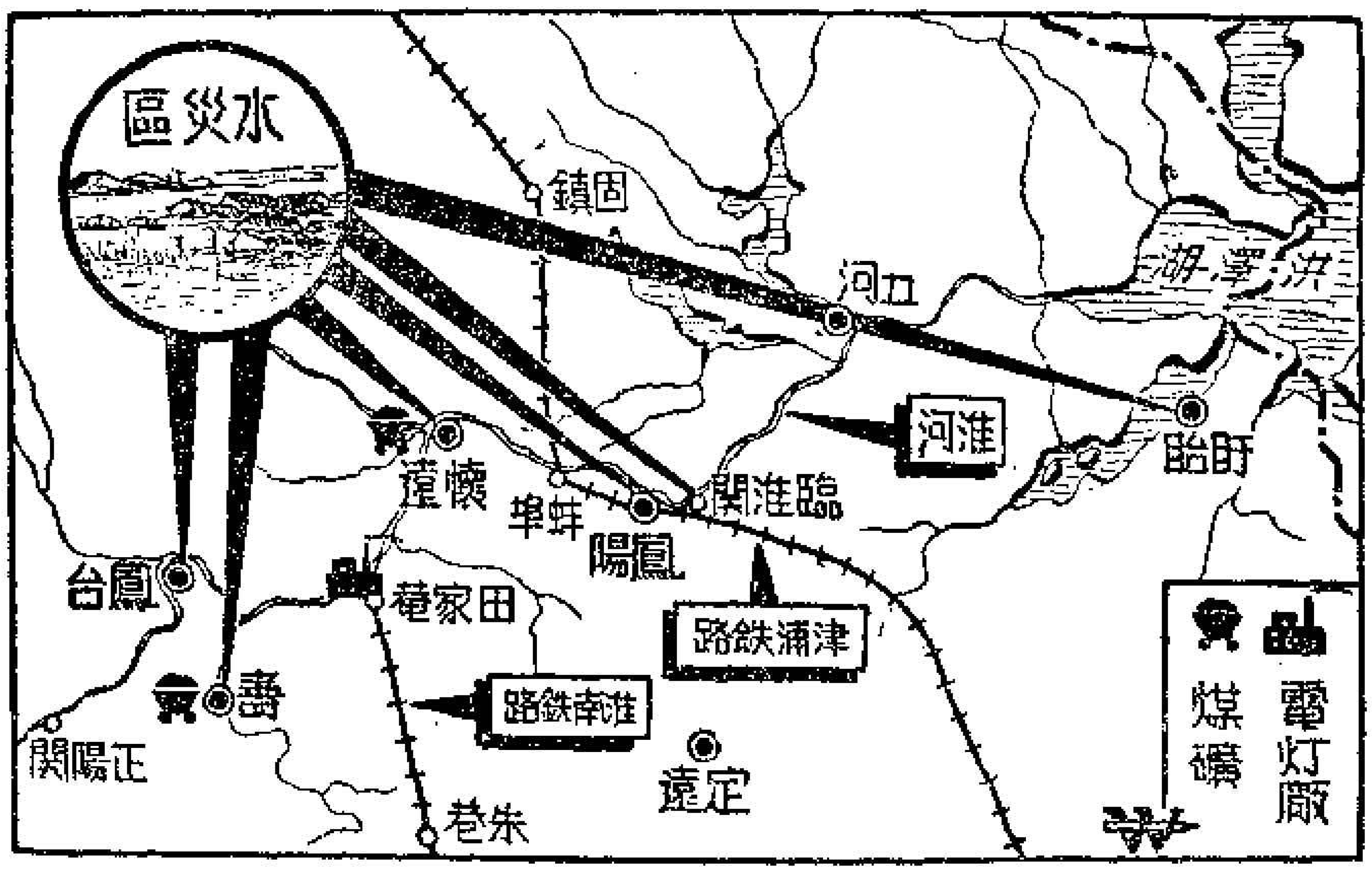
（觀察淮南通訊）淮河橫貫皖北，流經安徽省霍邱、壽縣、鳳台、懷遠、鳳陽、盱眙諸縣，入洪澤湖。淮北支流錯綜，西北而東南，朝宗於淮。淮南湖沼，星羅棋佈。兩淮通稱「淮上」，地形複雜。人民直朴無華，耐勞苦，重然諾，有燕趙悲歌之風，是歷史上健兒的崛起地帶。

「淮上」是富饒的。俗諺云：「走千走萬，不勝淮河兩岸」；又云：「大灣熟三年，黃狗也給褲子穿」。兩淮的「大灣」，習指淮河邊旁的甬道。寬廣數十里，河水冲積的沃壤。出產大麥、小麥、綠豆、黃豆、高粱、芝麻：：。往年有三年收成，農家餘糧，推積如山。收三年，便指望淹一年。因爲不施肥料，淹一年可以恢復土地的肥沃，預卜來歲的豐收。歷史上的太平日月，正是說不盡的富庶，話不盡的風流。

「亂世人」不如「太平犬」，中國的天災人禍，寫成整本大書，也描不完農村的掙扎，人民的呻吟。沿門託缽的花鼓女郎唱過：「說鳳陽，話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正說出兩淮人民九年來在天災人禍傾軋中的哀音。抗戰軍興，廿七年花園口黃河決隄。黃水入淮，兩淮胥腴，盡成黃泛區。每年夏季漲起的黃水，淹沒田園房屋，吞噬去二麥高粱。冬日水落，殘屋已危危欲倒，土地裏未萌芽的種子，腐爛在黃沙裏。那爲人民歌頌過着的底的「大灣」，蓋上一溜一溜淤積的黃沙。薄的尺把深，厚的幾尺深。極目望去，黃沙無際，寶山濯濯，沃土變成沙漠的瀚海，穀倉已成災難相乘的荒涼地帶了。

今年，花園口合龍了。新的消息帶來新的希望。餘生的農民，周到生活源泉的大地。借來遠方親友的耕牛，幸辛苦苦墾闢沙磧，點上一顆顆自已捨不得吃的豆種。（淮南大畝，一畝地合江南三畝多。黃豆一畝須豆種一斗二升。鄉間一斗黃豆值四萬元，十畝地種子須五十萬元。農民中上人家，每日僅有二餐高粱粉所製的蜀粟粥充飢，此項口糧係到霍山，正陽關一帶採購。因高粱磨碎煮吃，味劣難於下嚥，可以節約糧食，所以採爲主食）。久淤的沙地，種子不易萌發。過量的雨水，又淹死了新芽。今年有的農家，屢播屢毀，已經播了第三次種子。地主可以賣出一部土地，換錢來買種子。自耕農除了典質衣物，祗有乞援於月息三分以上的高利貸。佃農無力買種子，多由地主貸給。農曆六月初，地裏的黃豆已長到一尺多高，農民耐着腹裏的飢腸，守望着地裏的收穫。天氣連陰，上游大雨，山洪爆發，淮水陡漲。三五天內，未設隄防的岸，河水漫上，泛濫地區，寬數十里。壽縣、鳳台、懷遠、鳳陽、盱眙諸縣均成廣泛的災區。

善後救濟分署原有撥濟麵粉，以工代賑，建築淮河隄防的打算。北岸隄防，農曆新正開工，五月間竣事，此次倖告保全。南岸則迄未着手，更有重重特殊的障礙。例如懷遠縣屬河南的上窰地區，有一道支流窰河。歷年被黃水倒灌淤塞，五月間善救署僱工開濬，上層挖土挖去後，下層淤泥深爛，無法着手。工程師計劃繞道兩側乾地，重開一段新道，並傾築隄。但新道須經過本省×大代表孫××私地，約四五頃。雖地方人士渴望興工，該代表以一已之私，橫加阻撓，活動當局停辦。山洪來時，淮水漫岸南流，窰河來洪，泛濫北流，這兩股洪水，淹沒了大灣的萬畝農田。可作爲天災夾雜人禍的典型範例。如今淮南各地的洪水，淹沒了淮南綿長甬道的窪地。臨淮關一帶，路側的農田，高粱桿一半插在水中，黃豆都淹完了，種子隨流水漂去。農民今年的希望，已經完結，空留下一身債務，不知怎樣活到明年。



鄉間重重的攤派，重重的苛雜，並未爲洪水帶去。地上毫無收穫的農民，還要償付急如星火，繁雜如麻的征款。地方政府職員，薪津微薄，不敷生活。縣府經常以「公務員生活補助費」名義，開派公款。專署不時也有攤派。再加上頻繁的過往軍隊，大量的攤草（麥楷），攤糧（綠豆、大麥、高粱用作馬乾）。鄉鎮公所有所謂「職員及槍兵生活費」，「辦公費」，「招待費」：：：。除縣級平均額不大，過軍供應流動性大，無法統計外。單單鄉級公款，有地的農民，平均每月每畝地攤到法幣兩萬元。所謂「招待費」，鄉公所拿來送往迎來官長，聯絡本方士紳。公所裏大魚大肉，爐筵三日兩開。士紳們，既沾油水，本身又不出費子，樂得睜眼閉眼。鄉下人羅掘俱窮，收款的鄉丁，在農民家裏搜不出一粒糧，一棵草；便把人帶去「看祠樓子」。關在祠堂裏，一餓二打。家屬找到士紳說情，放出來限日交清。那怕是「丟鍋賣鐵」，也要還清這「閻王賬」。

近來適應軍事需要的徵壯丁，各鄉保多行花戶籌款買遊民抵充的辦法。每名壯丁時價約五百萬元。徵集一次壯丁，每家花戶要攤出十餘萬元。這些買的壯丁驗收了，經手人又常常得壯丁家屬的錢買放。再到鄉間任意去抓替罪羊，弄得鄉間鷄飛狗跳，人心惶恐。如今淮南農村多少窮人，不敢在家存身。一把鐵將軍，鎖住了破門，闔家走上流亡的路。或是到淮南煤礦去做工。男子下坑挖煤，女子洗衣燒飯，小孩子拾碎煤。估計淮南農村因水災、攤派、抽丁，因而棄家出走的約佔農村人口三分之一強。

卽是素稱富裕的中上地主，例如懷遠縣的宮宋楊林四大家族，平年每房都有千把石糧食地租的收入。如今災荒連接災荒，土地八九年沒有收成。政府的徵糧徵實，並未因而停止。地主祗得賣地籌款，購糧完徵。兼營商業的地主，境遇較好。不接近權勢的地主，依然無法逃避巨額的攤派。多少地主在棄零賣田地，來完捐納稅，購買口糧和種子。今日淮南農村的

浙大學生被捕慘死案

蕭揚

（觀察杭州通信）十月廿五日，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農藝系四年級學生于子三，農經系四年級學生郦伯建等數位，往旗下清泰旅館賀該校校友汪君新婚之喜。該校校友黃世明陳建新二人該日亦從上海乘車于八時許抵杭賀喜，彼此相遇於清泰旅社。于君為人忠耿誠摯，勤於服務，深得師生讚許。郦君為復員青年軍，平時沉默寡言，絕不參與任何活動。陳黃二君以前都是浙大農院學生，陳君今供職上海道中女中，黃君為中農職員。晚十時許，校本部同學均已返校，那時已無校本部開長出門農院校車，而郦君又久患脚病，未便夜行，于君亦須翌晨出席畢故教務長追悼會，為方便計，所以都留宿在延齡路黃陳二君所開的大同旅館房間內。深夜二時，軍警光臨；既無拘票出示，又不說明罪名，就將四同學脅迫捕走。

廿七日，學生會提出兩項基本要求：（一）立即無條件釋放被捕四同學。（二）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項。竺可楨校長及顧穀宜訓導長，會同學生代表，屢次奔波交涉，向省府、保安司令部、警局等各機關探查。保安司令部一再推諉，說是被軍徒所捕，扣押地點不明。後經嚴重抗議，要求依法於二十四小時內立即提送法院，不得蔑視法律人權，保安副司令竺鳴濤（正司令沈省主席兼）才承認四人被拘於警局獄中，并保證說：證件整理完畢後，准予廿八日將被捕四同學送法院。警察二分局長也是這樣說。

起初司令部和警局公佈的四人的罪狀是：該夜四人在旅館中密談，或遞送紙條，互相交換意見；「顯係圖謀不軌」，有「奸匪嫌疑」。從于君（學生自治會修改章程委員之一）身上搜出的會章修正案，從陳君身上搜出的一封南京友人寄來的信，其中文字「含義不明」，這就是「奸匪」的證據云云。四人每天被疲勞審問，精神甚感痛楚。

廿八日，司令部失約未送法院，但說「廿九日一定送法院」。竺校長訪問返杭之沈主席，沈答這是治安機關的事。至此事實已極明顯，所謂「送法院」僅是一種搪塞，這對善良期望的學生無異當頭棒喝，當局視為畏懼的學潮終被治安機關之一再不依法而「煽惑」起來，全體學生義憤決定：若至廿九晚同學尚未開釋，則於三十日起罷課三天，并商討營救對策，以維護四同學安全。

廿九日晚十時，省府畢祕書打電話給校方，欲親自訪問校長。二十分鐘後不見蒞臨，校長訓導長決意親訪省府。不一會，訓導長獨自返校，報告驚人噩耗：于子三已在牢中「自殺」！保安司令部解釋道：「于君和陳君二人從警局提到司令部，六時前曾審問于君二小時，于君只是痛哭，扶還獄中時仍痛哭不止。六時廿分發覺他已倒在牀上，氣絕身死。檢驗後喉嚨有二深洞，滿頭滿面是血，是用搜出的二塊玻璃片割進喉頭自殺的。」竺校長本有病在身，當場看了慘狀，曾暈厥過去。校長離開司令部時，司令部要校長簽字證明他看見于君自殺身死，校長經考慮後拒絕，僅書他在場時已見于君身死。至於其他三人已漏夜提送法院。

于君的「自殺」是一個謎，此事有許多疑點。

浙大教授對此案件，極表痛恨。提出與學生一致之主張：(一)調查「自殺」眞相，嚴究罪行責任。(二)向最高當局及司法院最高法院等控告保安司令部竺鳴濤有意謀殺于君。學生教授的意志非常堅定。

地權轉移，土地兼併，無聲地急劇進行。這些無生產的黃泛地，全靠眼光遠大的新興人物，來廉價收買大量兼併。今年泛地地價約每畝十六萬元，花園口合龍後，曾漲至每畝四十萬元。買地的新興人物，多是淮南煤礦的經理、職員、工頭們；乃至九龍岡（礦區所在地）一帶發了國難財的商人。（淮南經理張子嬰近年已置產數千畝，是一卓例。）當然還有旅外的軍人和官僚。老的地主階層已經沒落，新興的「暴發戶」在內地社會崛起。

提到淮南煤礦，位在懷遠縣屬的九龍岡。原有民營大通與國營淮南兩礦場。勝利後，據聞「某院長派人接收私營，經接收清查國發覺，交政府再接收。據稱原接收時，整理礦務，資方墊款甚多。國庫一時無款撥還歸墊，現今出租給中國銀行經營。」正說明了國營事業的荷包原是套在官僚資本的大荷包裏。

淮南煤礦，開支浩繁。職員待遇不薄，生活優裕。享用有小洋房，每人一具搖頭電風扇，和冰箱等近代設備。當地土著有「上有天堂，下有礦場」之諺，足見對該礦職員生活的欣羨。有一宮君，是該礦聘請的本地顧問，終日無所事事，每月淨得公司送給淨值四百萬元的煤炭，作為伕馬費用。該礦高級人員的收入，可窺見一斑。

淮南除二礦外，近在壽縣的觀音山，開闢一處新礦。日本人在田家庵建築的大電燈廠亦被該礦接收合併，規模更為宏大。兩淮藉以為食的農民，除卻流亡異鄉求生活者外；很多到淮南，當下坑挖礦的「煤黑子」。這裏勞動力供過於求，低廉的工資，尚須經過工頭的剝削。礦山下坑工人，日夜兩班，每班約萬餘人。在地下平坑道挖煤，每工工資八千元，工頭僅祗發給六千元。下窰洞的「掏天梯」（即向上挖的）每工工資一萬二千元，工頭僅發一萬元。工人領工資，須經工頭主持的「大櫃」發放，在這裏工資經工頭扣成。照人數估計，每天工頭們剝削所得約四千萬元。這駭人的數字，一部份孝敬了上司，點綴了職員。這說明了那些工頭購田置產豪闊。例如工頭喬寶山，二年來即在洛河鎭一區，置產已有兩百畝之多。新工須孝敬工頭禮物，方得入礦工作，平時更須善體工頭顏色，稍有不馴，隨時可被開革。所以對這種驚人剝削，知者亦不敢言。深達數十丈的窰洞，更常有出口坍塌，封閉坑道，活埋礦工的慘劇演出；殉難礦工，一次多至數十人。公司給一薄材殯葬，有家屬的可領二三十萬元撫卹費。

淮南所出煙煤，大部經淮南鐵路，津浦鐵路聯運南下。淮南路有兩段地區：一在蚌埠西十餘里處，一在蚌埠東「門台子」附近，當地流氓與路工勾結，有所謂「煤狗子」的組織。車過地頭，「煤狗子」的領袖，與火車司機，打一招呼。火車駛行漸緩，數十攜空蔴袋的「煤狗子」，一躍登車。裝滿蔴袋裏的煤炭，跳車而下，呼嘯以去。這種「煤狗子」組織，並備有武器，司機不敢忤逆，車上人避免吃眼前虧，寧與勾結，尚可分潤利益，已成公開的默契行爲。據一該車壓車人談：「淮南煤列車到下關，每節車皮約蝕耗煤炭三噸之譜」。這也是今日求生不得的人們所創造的新的求生方式。

（編者按：此稿係八月中旬收到，因通信稽擱，至本期始能刊出。今日淮上，恐較作者撰文時，又更多一番血淚矣）

論雅俗共賞

朱自清

陶淵明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詩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樂事，「素心人」當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這兩句詩後來凝結成「賞奇析疑」一個成語，「賞奇析疑」是一種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農家子弟是沒有份兒的。然而又出現了「雅俗共賞」這一個成語，「共賞」顯然是「共欣賞」的簡化，可是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賞，那欣賞的大概不會還是「奇文」罷。這句成語不知道起於什麼時代，從語氣看來，似乎雅人多少得理會到甚至遷就着俗人的樣子，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後罷？

原來唐朝的安史之亂可以說是我們的社會變遷的一條分水嶺。在這之後，門第迅速的垮了台，社會的等級不像先前那樣固定了，「士」和「民」這兩個等級的分界不像先前的嚴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來的多，士人流落民間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卻漸漸多起來。王侯將相早就沒有種了，讀書人到了這時候也沒有種了；只要家裏能夠勉強供給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個「讀書種子」；去參加那些公開的考試，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個紳士。這種進展經過唐末跟五代的長期的變亂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術的發達，學校多起來了，士人也多起來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責任也加重了。這些士人多數是來自民間的新的分子，他們多少保留着民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他們一面學習和享受那些雅的，一個却還不能擺脫或蛻變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這樣，也就不覺其寒塵；不但不覺其寒塵，還要重新估定價值，至少也得調整那舊來的標準與尺度。「雅俗共賞」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標準，這裏並非打倒舊標準，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會到或遷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讓大家打成一片。當然，所謂「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覺的看來是自然而然的趨勢。

中唐的時期，比安史之亂還早些，爲的是求真與化俗，化俗就是爭取羣衆。安史亂後，和尚的口語記錄更其流行，於是乎有了「語錄」這個名稱，「語錄」就成爲一種書述體了。到了宋朝，道學家講學，更廣泛的留下了許多語錄；他們用語錄，也還是爲了求真與化俗，還是爲了爭取羣衆。所謂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實和直接的意思。禪家認爲第一義是不可說的，語言文字都不能表達那無限的可能，所以是虛妄的。然而實際上語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種「方便」，既然是「方便」，記錄的文字自然越近實際的，直接的說話越好。在另一面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親切，才讓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獲得廣大的羣衆。道學主要的是中國的正統的思想，道學家用了語錄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這種新的文體的地位，語錄就成爲一種傳統了。此語錄體稍稍晚些，還出現了一種宋朝叫做「筆記」的東西。這種作品記述有趣味的雜事，範圍很寬，一方面發表作者自己的意見，所謂議論，也就是批評，這些批評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寫這種書，只當做對客閒談，並非一本正經，雖然以文言爲主，可是很接近說話。這也是給大家看的，看了可以當做「談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筆記最發達，當時盛行，流傳下來的也很多。目錄家將這種筆記歸在「小說」項下，近代書店彙印這些筆記，更直題爲「筆記小說」；中國古代所謂「小說」，原是指記述雜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這裏我們得特別提到唐朝的「傳奇」。「傳奇」據說可以見出作者的「史才、詩、筆、議論」，是唐朝士子在投考進士以前用來送給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紹自己，求他們給自己宣傳的。其中不外乎靈怪、豔情、劍俠三類故事，顯然是以供給「談助」，引起趣味爲主。無論照傳統的意念或現代的意念，這些「傳奇」無疑的是小說，一方面也和筆記的寫作態度有相類之處。照陳寅恪先生的意見，這種「傳奇」大概起於民間，文士是仿作，文字裏很多口語化的地方。陳先生並且說唐朝的古文運動就是從這兒開始。他指出古文運動的領導者韓愈的「毛穎傳」，正是仿「傳奇」而作。我們看韓愈的「氣盛言宜」的理論和他的參差錯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語化。他的門下的好難、好易兩派，似乎原來也都是在試驗如何口語化。可是好難的一派過分强調了自己，過分想出奇制勝，不管一般人能夠了解，欣賞與否，終於被人看做「詭」和「怪」而失敗，於是宋朝的歐陽修繼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礎。——以上說的種種，都是安史亂後幾百年間自然的趨勢，就是那「雅俗共賞」的趨勢。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賞」的路，詩也走向這條路。胡適之先生說宋詩的好處就在「做詩如說話」，一語破的指出了這條路。自然，這條路上還有許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黃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爲雅」的主張，並且點化了許多俗語成爲詩句。實踐上「以俗爲雅」，並不從他開始，梅聖俞蘇東坡都是好手，而蘇東坡更勝。據記載梅和蘇都說過「以俗爲雅」這句話，可是不大靠得住；黃山谷卻在「再次楊明叔韻」一詩的「引」裏鄭重的提出「以俗爲雅，以故爲新」，說是「舉一綱而張萬目」。他將「以俗爲雅」放在第一，因爲這實在可以說是宋詩的一般作風，也正是「雅俗共賞」的路。但是加上「以故爲新」，路就曲折起來，那是雅人自賞，黃山谷所以終於不好懂了。不過黃山谷雖然不好懂，宋詩卻終於回到了「做詩如說話」的路，這「如說話」，的確是條大路。

雅化的詩還不得不回向俗化，剛剛來自民間的詞，在當時不用說自然是「雅俗共賞」的。別瞧黃山谷的有些詩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詞可夠俗的。柳耆卿更是個通俗的詞人。詞後來雖然漸漸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終不能雅到詩的地位，它怎麼着也只是「詩餘」。詞變爲曲，不是在文人手裏變，是在民間變的；曲又變得比詞俗，雖然也經過雅化或文人化，可是還雅不到詞的地位，它只是「詞餘」。一方面從晚唐和尚的俗講演變出來的宋朝的「說話」就是說書，乃至後來的平話以及章回小說，還有宋朝的雜劇和諸宮調等等轉變成功的元朝的雜劇和戲文，乃至後來的傳奇，以及皮黃戲，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學」。這些除元雜劇和後來的傳奇也算是「詞餘」以外，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裏簡直沒有地位；也就是說這些小說和戲劇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裏多半沒有地位，有些有點地位，也不是正經地位。可是雖然俗，大體上卻「俗不傷雅」，雖然沒有什麼生位，卻總是「雅俗共賞」的玩藝兒。

「雅俗共賞」是以雅爲主的，從宋人的「以俗爲雅」以及常語的「俗不傷雅」，更可見出這種賓主之分。起初成羣俗士蜂擁而上，固然逼得原來的雅士不得不理會甚至遷就着他們的趣味，可是這些俗士需要擺脫的更多。他們在學習，在享受，也在蛻變，這樣漸漸適應那雅化的傳統，於是乎新舊打成一片，傳統多多少少變了質繼續下去。前面說過的文體和詩風的種種改變，就是新舊雙方調整的過程，結果遷就的漸漸不覺其爲遷就，學習的也漸漸習慣成了自然，傳統的確稍稍變了質，但是還是文言或雅言爲主，就算跟民衆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至於詞曲，雖是新起於俗間，實在以音樂為重，文辭原是無關輕重的；「雅俗共賞」，正是那音樂的作用。後來雅士們也曾分別將那些文辭雅化，但是因為音樂性太重，使他們不能完成那種雅化，所以詞曲終於不能達到詩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樂，雅化更難，地位也就更低，還低於詞一等。可是詞曲到了雅化的時期，那「共賞」的人卻就雅多而俗少了。眞正「雅俗共賞」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詞，元朝的散曲和雜劇，還有平話和章回小說以及皮黃戲等。皮黃戲也是音樂為主，大家直到現在都還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戲詞，所以雅化難以下手，雖然一二十年來這雅化也已經試着在開始。平話和章回小說，傳統裏本來沒有，雅化沒有合式的榜樣，進行就不易。三國志演義雖然用了文言，卻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語的文言，後來的水滸西遊記紅樓夢等就都用白話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傳統裏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經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淺，決定這種地位的高低或有沒有，一方面也決定「雅俗共賞」的範圍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賞」的人越少，越淺也就越多。所謂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農家子弟。在傳統裏沒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藝兒；然而這些才接近民衆，接近民衆卻還能教「雅俗共賞」，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會的兩橛了。

單就玩藝兒而論，「雅俗共賞」雖然是以雅化的標準為主，「共賞」者卻以俗人為主。固然，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傷雅」才成；雅方看來太俗的，以至於「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賞」的。但是在什麼條件之下才會讓俗人所「賞」的，雅人也能來「共賞」呢？我們想起了「有目共賞」這句話。孟子說過「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有目」是反過來說，「共賞」還是陶詩「共欣賞」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別，自然也就能「共賞」了。孟子接着說：「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這說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謂人情不相遠，但是這不相遠似乎只限於一些具體的、常識的、現實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罷，故宮和頤和園，包括建築，風景，和陳列的工藝品，似乎是「雅俗共賞」的，天橋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說到文章，俗人所能「賞」的也只是常識的，現實的。後漢的王充出身是個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說話，反對難懂而不切實用的辭賦，卻讚美公文能手。公文這東西關係雅俗的現實利益，始終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說後來的小說和戲劇，有的雅人說西廂記誨淫，水滸傳誨盜，這是「高論」。其實這一部戲劇和這一部小說都是「雅俗共賞」的作品。西廂記無視了傳統的禮教，水滸傳無視了傳統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壓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還不太遠的，也未嘗不高興這兩部書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這可以說是一種快感，一種趣味，可並不是低級趣味；這是有關係的，也未嘗不是有節制的。「誨淫」「誨盜」只是代表統治者的利益的說話。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是個新時代，新時代給我們帶來了新文化，產生了我們的知識階級。這知識階級跟從前的讀書人不大一樣，包括了更多的從民間來的分子，他們漸漸跟統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間。於是乎有了白話正宗的新文學，詞曲和小說戲劇都有了正經的地位。還有種種歐化的新藝術。這種文學和藝術卻並不能讓小市民來「共賞」，不用說農工大衆。於是乎有人指出這是新紳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歐化，不管一般人能夠了解欣賞與否。他們提倡「大衆語」運動，但是時機還沒有成熟，結果不顯著。抗戰以來又有「通俗化」運動，這個運動並且已經在開始辨向大衆化。「通俗化」還分別雅俗，還是「雅俗共賞」的路，大衆化卻更進一步，要達到那沒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賞」的局面。這大概也會是所謂由量變到質變罷。

（上接二頁）然而我最悲痛的是我們中國的可憐人民，處于如此情景之下，死都不能速死。共黨爭到統治地位以後，還要人民不要？農業荒廢，到處無人煙，工礦毀壞，人民沒有用的東西，房屋拆的無地不是瓦礫一片，大家都沒有住處，濶到富的窮了，貧的也不見富。我也知道他們先利用壞人，導倡鬥爭。晉南人太悲慘了，家家人人都不得活。今秋的田禾沒有收，明春還得餓死。我不懂，難道共產主義是不准人活的嗎？什麼法律、道德、人情、理知，在晉南都沒有了，為何用刑要那樣的慘？我不但要為晉南人呼籲，還要向全國人士呼籲。為什麼那樣花樣翻新，推磨拉車說不出的，叫他死不下去。難道人類文明進步命革，就是如此？晉南永濟有一部人民不堪這種殘酷，起來反抗，也殺死那些殺人的凶手。但他們那點力量，於十月十三日以後，被共軍派來一支軍隊打勝了，這一下，那些共黨鬥爭者返回來，把趙村鄰近各村莊的老百姓，殺的更慘，見人就殺，並不殺死，或是割去手，殺去腳，活活的把人嚇死。先生，我要哭了，我不會描述那樣生動。這些消息請你也登載一下。我知貴刊不是國，也不是右，為晉南人訴訴苦，我也不是　，也不是右，我這樣暈頭昏腦的聽到見到，站在人的立場上，我要叫喚！

張強立泣述　十月卅日　西安

鄉間苦

編者先生：久住繁榮的城市，就會忘記了破敗的鄉村。住在城市中的人們，想到鄉村時，祇想到山水的明秀，很少想起那些面黃肌瘦、嘴流黃水、皮膚腫裂的那些在生死線上掙扎的人們的悲慘景象！去年暑假我回到鄉村去，我深深地感覺到有一股濃厚的空氣在醞釀着我。這空氣給我以寢食不安的焦慮與恐懼。焦慮的是這些人民將怎樣的活下去？恐懼的是一旦當大多數人民不能活下去的時候，國家還會不崩潰嗎！古今中外，不管是君主政體、民主政體、或者獨裁政體，只要到人民不能再活下去的時候，總要來個大翻筋斗。現在政府已聲稱實行憲政，而且層層官吏都是滿口民主，閉口民主，可是沒有做出一件眞正與人民福利有關的事來。例如政府改組後，黨的經費規定由黨自給。可是我暑假在鄉間，見保長挨家挨戶的催繳黨的經費，並按田畝攤派，這使我十分驚異。後來始知是縣黨部募捐式的捐款，隨人樂捐，而鄉長即令保長挨戶攤派。將款的多少，由保長自由斟酌。假使保長收了一百萬元，他自己起碼要攤入荷包三十萬元，經鄉公所而達縣黨部最多不過是五十萬元。保長經手捐募的錢愈多愈是有功，亦愈有好處。痛苦可是在人民呢，差是哼的一聲累得跟都花了，牙也咬得格格作響。不給吧，保丁與鄉丁的利害又是吃不消。其他諸如此類的事多極了。人民苦衷，向何處伸訴？又向誰去伸訴？再說鄉保長們，他們為着狼狽為奸詐大抵結為異姓兄弟，遙天地以盟誓。這樣在鄉保長之間是「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了，小百姓還敢興風作浪嗎？

胡　楷　十月廿三日　安慶

白報紙的浪費

編者先生：報紙本來是供給讀者讀的，但有時卻浪費得不近情理。譬如這次雙十節，各報都出特刊，有一家增出至六號。他們批給報販時，仍照原價批售（報販零售時，常常加價），因為那天的紙張多，所以大家都儘量批購。賣不完的報，便賣給收買舊報紙的人，拿去作為包花生米等用。聽說一張整張而不破碎的舊報紙，即值四五百元。所以報販多批以後，即使賣不掉，仍可賣給舊貨店，不吃虧。可是白報紙卻在無形中浪費不少。值此政府節約紙張之際，此事應當提出，以供當局參考。

李　瑜　十月二十六日　蘇州

觀察文摘

論存儲反應

原作者：吳世昌

原刊處：文訊月刊七卷四期

以前有人講笑話，說三十年前的小孩子作文，教師還沒有出題目，學生已經在紙上寫好了第一句「人生在世」或「爲人之道」。較高的年級，任何文章都可以用「嗚呼」開頭。自從小學的課本改爲白話以後，這一類萬金油式的套語不再出現，因爲小孩子腦筋中不再堆積這一類材料了。但也有一時期，不論名人講演，雜誌論文，學生作文，經常以『自從五四運動以來……』開頭。抗戰時期，我在後方各地教書，每年暑假要看幾百本入學試卷，開始幾年，所見卷子的第一句話幾乎千篇一律的是『自從蘆溝橋事變以來，』這是文言白話都適用的起句；或者是『蘆溝橋的砲聲響了！』這是白話文的引子；或者是『時代的巨輪不斷地前進着……』這是受了所謂「社會科學」文字的影響。抗戰末期的文卷，則「蘆溝橋」告退而「珍珠港」或「太平洋」代興，「自從太平洋事變以來」又流行一時。另外有些「夫××爲××之本」之類，和「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交織成文。這種「之本論」，當然要歸功於中央訓練團之念茲在茲。去年暑假我又看一批招生試卷，題目是「釣魚」，我發現平均有百分之二十的考生，都有「一個未婚的叔叔，常常帶我去釣魚。」因爲這些考生都讀過某一篇英文的翻譯。今年一批試卷的一個題目是『孔子言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也已試申其說』。除了有些考生根本看不懂以外，看懂題目的考生，有百分之四十說來說去是『青年是國家的棟樑，社會的精華』一些話頭。這決不是互相抄襲，以致雷同，因爲這些卷子來自不同的試場。有的也說明這兩句話的出處，是某要人的講演之類。我舉這些例子，並無意思要譏笑這些考生，而因爲這裏面有一些重要的問題，最明顯的是教育問題，大一點也可以說到國家問題。

這些現象，其實也並不限於學校中的青年。官場中黨團的中年，也並不例外。所以從前吳稚暉先生有「黨八股」「洋八股」「土八股」之說，後來順理成章，自然會有「抗戰八股」。青年有此現象，不能不說是中等教育的一部份失敗。誰使青年的思想「凍結」，文字表達能力凝成定型？中國目前能受中等教育的孩子並不多，如果這些人的思想都凍結了，這個民族的前途大可憂慮。如果青年思想凍結，是受教師的陶冶，而教師之所以如此陶冶學生，乃是有所秉承，則中國教育的前途更爲可怕了。

但我希望上面的推論不準確，而用別種方法解釋這種現象。

英國的一個作家曾經說過：『第一個用花來比美人的是天才，第二個是庸才，第三個是蠢才。』因爲他不肯運用思想而只知抄襲別人的說法。新文化運動時胡適之先生要打倒舊文學，建設新文學，就是因爲舊文學中現成而不用費腦筋的話太多。于做詩，那些「夕陽」，「芳草」，「殘陽」，「秋風」，推不開，拆不掉地擠攏來。這些都是不用費腦筋，只要把預先堆積在腦中的現成材料，搬出來就是，並不考慮這些現成材料能否代表他所要傳達出來的思想或情感，甚至不問這些材料和他的思想情感有無關係。現代西洋心理學派的文藝批評家對於這種現象下一樣名詞叫作 Stac's response，這個名詞我姑且譯作「存儲反應」。

存儲反應和抄襲不同。抄襲有時是低能，有時是欺騙，或二者兼而有之。第三個用花來比美人的人，如果他根本沒有聽過前二人的說法，我們不能說他蠢才。惟其因爲這是爛熟的比喻，他不會想或不肯想別的說法，而又須形容美人，只好照抄，所以蠢。在這種情形之下，抄襲是被動的，存儲反應卻是主動的，與抄襲有一共同點是懶於思考。一個人腦中堆積了若干材料，有一些是他最熟悉的，其所以熟悉，或者是因爲他特別喜歡，特別得意，或者是因爲他時常碰到別人也用。一有「機會」，他立刻把最熟悉的材料順手牽羊地搬出來，有時竟與這個「機會」（照心理學上說法應該是「刺激」）無關；有時他搬出來時也經過選擇，自然爲是最合適的（因此也是他最得意的）反應；而實際上是最平庸最陳腐最俗濫的。一切八股——黨，洋，土，抗戰……之來源，都可以用存儲反應來解釋。

構成存儲反應的條件，除了懶於思考以外，個人的才智與學力也是主要的。而學力又爲環境所限，學力的限制，成爲思想的貧乏。如果一個中學生除了課本以外，所讀的只是大禮堂中掛的「守則」和報上要人們的三等祕書所擬的講詞，則除非天才，他不能有創造的思考（Creative thinking）。他腦中只存這些貨，你要他搬出別的來是苛求。才智高的人，選擇能力也高，也知道藏拙，知道避免陳腐俗濫的反應。甚至在存儲的過程中，已加選擇，有所揚棄。

但如果存儲反應的人都是才智不高或學力不夠，也是不公平的。也有人才智學力並不在平均之下，却因爲有某種心理疙瘩（Complex），也可以造成另一種存儲反應。暴發戶愛買字畫古書，陳設在客廳裏，表示他有文化教養，正因爲他有文化的自卑疙瘩，所以造了一種自傲或優越疙瘩，存儲在心中，常常要反應出來。讀了一兩句舊書的，常常愛搬出來，賣弄他的「國學」，並無內容的文章偏要學古書的調子，擬些古體進去，「以艱深文其淺陋。」到外國跑過一趟的，講演時總不忘記表示身份：『When I was in America……』下野的軍閥喜歡念佛，臨碑帖，刊點經書，表示他不但心腸好，而且也有點文化。在營裏受虐待的士兵，一出來遇見老百姓，便因威十足，開口「老子」，閉口「混蛋」。理髮匠和廚子愛自稱「理髮師」和「廚師」。這些現象的本身只是心理上的補償作用（Compens-ation），這種補償材料堆積得久了，也會變成存儲反應，一觸即發，不能自制。

也有因爲要替天行道，傳道，衛道，播道，自己腦筋中有一套思想或觀念，（其來源不論由於受了訓練，或由於自我教育，其爲存儲則一。）「以爲天下之美盡在己」，心腸好的，想傳授別人，優越疙瘩特別發展的想統制別人，自己被那種思想範圍住了，束縛住了，而不自知其可憐，却要傳教衛道，流傳經種，或拖人下水。人類有許多宗教上政治上的悲劇慘象，可能是由此發生的。若干宗教和政治人物鑽進了牛角尖，變成神經失常。希特勒之流的好戰分子明知戰爭終於要毀滅自己，而仍瘋狂似的進行戰爭者，正因爲某種特殊的存儲反應佔據了他，迷住了他，對於許多政治上的問題不能有別的反應，變成瘋狂狀態，無以自拔故也。

存儲反應的存在，其故有時不在作此反應者，而在他的對象的要求。例如有些黨八股官八股，是作者的上司要他這樣做，他所處的環境只許他這樣做，他才這樣

做的。這是比較特殊的情形。但久而久之，特殊也變成通常了。有時則因爲不僅作者，連讀者也懶得用思考，只要看些用現成材料湊成的東西，正因爲作者來得「順手」，所以讀者看得「順眼」。看自己看慣了的東西抵抗力小些，比較省力。省力有時被認爲痛快，所以也有人叫好。這可以解釋許多現象：舊時文人看熟了典故，因此作者歡喜用典。彷彿家鄉的樹名，說出來你我均知，自有親切之感，（這裏還有一個聯想問題，茲不討論。）「平平仄仄平平仄」的調子，哼了上千年，還有人要哼，正因爲還有讀者要看。武俠，偵探，鴛鴦蝴蝶派的小說，還有人依樣葫蘆的在做，也因爲社會上自有一班人專看這些小說而不看新文藝作品。這些讀者們也已經存儲了許多這類材料，看新東西反應起來要發腦筋，不如看同類的來得「痛快」。在這裏面，也含一個中國能否接受現代文明的問題。

一個人有存儲反應，許多人合起來的民族國家自然也有集體的存儲反應。一個歷史長久的國家，文化材料堆積得很多，歷史敎育變成了這些材料的反覆敍述，人民腦筋中裝滿了這些材料，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傳統，傳統本身變成人民的驕傲與自負，這便是構成民族保守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保守性本身便是存儲材料的堆積，保守的民族常拒絕新的東西，認爲他們所保守的最好，所以不願用別的東西代替它，認爲他們所保守的最得意，所以常常要反應出來，向別人誇耀。中國人稱讚一個人對於某事或某書熟悉，常用一個比喻：『如數家珍。』相反的則用：『數典忘祖』，可見「家珍」和「祖」，被認爲每人應該「存儲」的材料，如能「反應」則爲人所譽，忘記了則爲人所譏。中國這個 族並不反對存儲反應，從這兩個比喻中允分表現了出來。

保守者在新的環境中，遇見新的事情，不願接受新的原則，採用新的方法，自有他們可驕傲的老法子來應付。在這一個意義上，存儲反應阻礙了進步。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產，應該增加這個民族的智慧；遺產愈多，智慧的增加也該愈精。但如果這些文化遺產已經和新來的環境脫了節，而它所增加於這個民族的不是智識而是存儲反應的習慣：保守，固執，偏見和對新事理的峻拒，則這些文化遺產對於這個民族，反而變成成沉重的十字架了。

不幸今日的中國正處在類似這樣一個情況之中。過去的歷史太悠久，文化太豐富了，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一分驕傲；近百年來新出現的環境太突然，新來的事理太可怕，太「不合國情」了。但是因爲存儲的材料太多，反應也就不能出此範圍，不肯承認「西夷」也有文化。及至新的現實越來越可怕，越不可抵抗，而存儲反應仍然在作祟，於是想了個調和辦法，叫作「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骨子裏仍不承認西學也有其體。等到調和辦法仍然失效，這個民族的被侮辱與被損害成爲無可抵抗時，一種普通的自卑疙瘩佔有了這個民族，索性喪失了自信力，變成懼外媚外的心理。後來國民革命和抗戰稍稍恢復了一點自信力，培養了一點自尊心，於是數千年來的存儲反應又立刻作祟了，把「五四」所培養的一點現代國家的新基礎：民主政治，科學精神，自由主義，人權觀念，施以無情的打擊。打擊者戴着「特別國情」的帽子，穿着「正統」的法衣，掛起「衛道」的旗旛，捧着「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的神主，要替我們祖先的「固有文化」，做「張皇幽眇」的盛業，如果這個「固有文化」並沒有和這個民族所處的現實環境脫節。爲了這個盛業，我也願意執鞭隨蹬。如其不然，則這種存儲反應對於使中國爲現代國家這一件事情有利或有害，還是無待著論了。

一個小孩子不看清題旨而用存儲反應來敷衍一篇作文是可以原諒的，至少敎育他的人也要分担一部分責任。少數人不能接受新文藝，喜歡一種用存儲反應寫成的文體，譬如有些家庭婦女愛看彈詞小說，也並無大害。但當一個民族不能認清它本身的現實環境，不能適應這個環境，而有意無意地用存儲反應來應付當前局面，甚至有人還想統制麻醉或迷惑別人，使別人也和他一樣只知道用存儲反應，則對於這個民族的心理衛生大有妨害，因之也妨害這個民族的進步與發展，甚或可以威脅其生存。

對於「固有文化」固然不能作爲存儲反應的法寶，對於外來的思想，制度，文化，也同樣的不能使它堆積成爲存儲反應的材料。其理由我想不必再複述。

眞正要使中國列於現代國家之林，不是靠盟軍打勝仗而躋列四強或五強，則中國人的自由思想，有鑑別力的思想，有選擇力的思想，能適應的思想，創造的思想（Crative thinking），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而這些思想，都是與存儲反應不相容的。

卅六年八月廿七日　南京

（上接十三頁）自貿易局長升任爲經濟部長的克利潑斯是工黨的健將我們已久仰，而接替貿易局長的年青的威爾遜是工黨中的後起之秀。在過去兩年中，他在克利潑斯之下担負着對外貿易的一切重任。他最近支持的兩件大事：一是談判修訂英蘇商約，一是參加日內瓦的國際通商會議，雖然兩者迄今尚無結果，但他確是爲祖國盡了最大的努力。要與蘇聯恢復通商關係，在目前的情勢下，本是難事，但威爾遜和蘇聯對外貿易委員米高揚一再的折衝，一再的忍耐，現在談判雖然暫停，他還希望另覓途徑，打開僵局。在日內瓦國際通商會議中，威爾遜要處處小心對付美國人。除了蘇聯集團，戰後美國經濟的力量幾乎是無處不到，威爾遜的奮鬥便在挽救大英帝國的經濟被捲入金元的狂瀾。

威爾遜的精敏強幹，不但已爲上司所賞識，一般人民也已知曉。尤其以而立之年勝任要職，繼而入閣（他今年三十一歲）都傳爲美談。這與其說是工黨政府的開明之處，不如說英國的政治，或更廣泛的說英國的整個社會在劇烈的演變之中。威爾遜以牛津青年學者的身份效忠於爲學府傳統精神所不容的標榜社會主義的政府，不能不說是一種新的氣象，新的希望，因爲在牛津尚有此等人在，何況其他受紳士訓練和保守精神影響較淺的學校和工廠。

幾陣秋風過去，初冬已光臨英倫三島。倫敦的天氣日漸轉變灰色，這是警告英國人民最艱難的時期已經開始了。因爲管外匯法令的實施，從倫敦到巴黎的箭號特快車上旅客寥寥，比之往日擁擠的情形，誠有不勝蕭條之感。英國報紙喻十月一日爲英國旅客的鄧闢克，實含有深長的意味。

中宣部（35）刊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